

谷雨

讀享·九州

讀享九州
JIUZHOU PRESS



精彩看点

我的朝鲜战争

——口述历史中的朝鲜战争

创刊词

林语堂：论躺在床上的妙处

杨天石：不只凭蒋日记写近代史

钱穆：我的一生

阎崇年：读书四忌

管窥世象，蠡测人性

——读余世存《人间世》

十位名人的人生和卦象

冯友兰：

两束雄文，一抹背影

我更爱你备受摧残的容颜

最初的国会，晚清崩溃的丧钟

创刊词：愿为我们的时代记录一份真

今天，公元2015年4月20日，农历谷雨，“雨生百谷”是为“谷雨”。《通纬·孝经援神契》谓：“清明后十五日，斗指辰，为谷雨，三月中，言雨生百谷，清静明洁也。”

作为春季的最后一个节气，谷雨之后，再无寒潮，正是播种掩瓜点豆的上佳日子。北方吃香椿，南方喝雨前茶，习俗虽异，不过生气勃勃之势并无差别。因此，谷雨，也是我最为喜爱的节气。我爱它带给万物以雨露和滋养，我更爱它带给大地的这种希望和冲动，这种动律和勃勃生气。

因此，我们把这一份洋溢着春的芬芳、孕育着夏的气息的读书会会刊——《读·享|九州》的创刊日，定在今日。以后的每一个节气之时，就是它与大家的相约之日，读享九州，伴君四季！

从我们决定开启这段全新的旅程的那一刻起，我们已经满怀欣喜和期待，期待在这个阅读人生之旅上与大家的同行；我们也略带忐忑和担忧，担心在这越来越标准化的时代，究竟能有几人愿意从那列随波逐流到终点的列车上跳下，与我们同路去探求一个不可知的未来？

欣慰的是，在这个浮躁的时代，还有一些人愿意慢下来、停下了。而你们正是我们创刊《读·享|九州》的信念和信心所在。

这信心，源自这每一期书友们认真的侧耳倾听；源自每一次经典文字的贴心回馈；源自每一本走心著作的满满读书笔记。

因为有你们，我们的不安和忐忑渐渐廓落，因为有你们，我们的决心更加坚定。

九州读书会从建立至今，已经举办了56期。从第一期之时的略显仓促和无措，到现在的从容淡定，每一期分享会的每一个细节，都像烙印一般印刻在我们的脑海。我们的读友，从无到有，从一到十，从十到百，从百到千……

世界很大，我们想出去走走，记录每一个我们不曾遇见过的奇妙；世界很快，我们不该随波漂浮，人生如一次旅程，没有任何人有权利决定你自己的人生。世界原本就该精彩，每个人都是这精彩世界中的一份子，充满变数和未知，才是一个世界的原本模样。

满是未知的世界里，一群自我的人，在这个角落会聚，憧憬每一个黎明，这是我们的期望和盼许。因为，我们愿意为我们的时代记录一份真。

欢迎来到《读·享|九州》！



九州出版社《读·享|九州》编辑部

2015年4月20日



500



佟麟閣路85號國際創意文化中心
#85 Tong Ling International Creative Cultural Centre



我的朝鮮戰爭

——口述歷史中的朝鮮戰爭

嘉賓：沈志華、崔永元、李丹慧、口述歷史項目組張新

時間：2013年6月22日（周六）14:30—16:30

地點：佟麟閣路85號國際創意文化中心

（北京市西城區佟麟閣路85號）

活動議題：

口述歷史的現狀、口述歷史項目組進展情況和規劃，關於朝鮮戰爭，臺灣海外研究現狀等。

座位有限，先到先得





张海涛：每个人的经验都是值得告诉别人的



凤凰网读书：大家下午好。我们今天的读书会是由九州出版社、中国传媒大学崔永元口述历史研究中心与凤凰网读书会联合主办的，台上的5位嘉宾，可以说都是各自研究领域的侠者。坐在中间这位是著名历史学者、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沈志华先生，这位我就不用介绍了，准历史学者兼主持人崔永元先生，这位是沈志华先生的夫人李丹慧女士，李老师在国际冷战史研究领域也相当有成就。这位是陈兼先生，他是著名的中美关系问题专家，我们掌声欢迎。

除了台上这几位嘉宾之外，我们台下也云集了很多远道而来的嘉宾，我就不一一介绍了。九州出版社的总编辑张海涛先生也来到了我们的活动现场，我们就先请张总编辑来为我们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这场带有华山论剑意味的读书会的缘起。

张海涛：大家下午好。我们九州出版社出了一套台湾中研院口述历史系列，大概将近30本，就请了专门研究朝鲜战争的专家沈老师、陈老师、李老师，还有崔永元老师的口述历史研究中心，我们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因缘而聚合到一起。沈志华老师的冷战五书《朝鲜战争》，也是研究朝鲜问题的。崔永元老师的口述历史研究中心，专门有一个抗美援朝的项目组。

我们大家今天就一起集中就谈谈朝鲜战争。我做开场白，简单讲一讲我对这个主题的理解，那就是：历史的人看人的历史。我在很早的时候，就看到南斯拉夫党内一个著名的理论家，叫道吉拉斯，他有点像我们中国的顾准这样的人物，发表了一些跟当时的主流观点不太一样的观点。后来这个学者就被抓起来枪毙了。

他的书里有一句非常有名的话，“每个人的经验都是值得告诉别人的”。后来在写一本书的序言时，我引用了这句话。我当时是这样想，为什么每个人的经验都值得告诉别人？因为按古希腊的说法，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小宇宙。孟子说，万物皆备于我。这就是说，每一个人的个性里面包含了整个宇宙、整个国家，整个人民的共性，所以他的经验讲出来，每一个人都能够共同分享。

但是这个道理有时候又不通，因为我们的出这一套口述史，其实是相当好看。比如说，有一本《白瑜先生访问记录》，他讲到了年轻时代的毛泽东，非常厉害。当时毛泽东提前预见到了蒋介石将对共产党进行的清洗，白瑜先生跟毛泽东年轻的时候是同学，他就问毛泽东：你发现这个问题，该怎么办？毛泽东当时就沉着脸跟他说：我不能告诉你。所以毛泽东在不告诉他的情况，自己开创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这就印证了古代的商鞅的一句话：成大事者，不与众人谋。毛泽东他一生他就是体现这样的雄心大志，包括发动文化大革命，那时候全党都被蒙在鼓里。

张海涛：这样的口述史非常好看，可是在

传播上，我个人认为是比较失败的，它没有进入大众的领域。这也牵出一个话题来：历史摆在那个地方的时候，是要由历史的人去看，去理解，去重新进行再表达。美国有一个历史学家叫贝克尔，他有本书叫《人人都是他自己的历史学家》，他把中国的“宋学”和“汉学”的争论，用西方的语言体系去表达了一遍。所谓汉学就是“我注六经”，古代的所有经典，我把它表达出来，它是什么意思，原话是什么，就像孔子编《春秋》，乱臣贼子惧，他就把古代发生的事编出来让你们看。到了宋学，就倒过来了，就是“六经注我”了，我来讲这些话什么什么意思，这句话什么意思，实际上就是对历史进行了再表达。口述史同样也面临这个问题：每个人的经验值不值得告诉我们大家？

我们最近还出了一套党史研究的书，有一个责编在文案上写的话，给我印象特别深，这句话是：一个民族要配得起它所承受的苦难。民族的苦难发生了以后，我们怎么样才能够重新来认识它、反省它，对这段历史重新进行再表达。如果不能进行很好地反思，不能进行很好地表达，我们就不配承受我们所受的苦难。所以我就想讲，历史的人来看人的历史，那是我们

每个人的责任。所以今天我就做个开场白,希望我们的嘉宾和大家进行更好地互动,谢谢大家。

崔永元:国外远比中国更重视口述历史



崔永元:非常高兴能参加凤凰网读书会,我接到通知的时候,是跟沈先生见面,我看了地址来的,我以为是在一个咖啡厅里,没想到是在一个教堂里。那我们首先应该说一句“阿门”,因为这个教堂存在下来都是一个奇迹,这就牵扯到一段历史了。今天来的朋友特别多,我们的教堂挤得这么满,将来我们的崔永元口述历史中心有一个大礼堂,可以容纳3000人,到时候请大家去,不过可能还是这么些人。

口述历史学科是于1948年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创立的,1959年胡适先生把它引进到了台北的中央研究院。我们看中国的口述历史到现在也没研究出一个具体的时间来,是哪年哪月哪日引进的中国大陆。

我想告诉大家,我们这个团队是崔永元口述历史研究中心,它是正规的组织,不是自发的组织,我们是有公章的组织。这个组织从2002年开始,主要是收集口述历史的资料,这个跟沈先生和陈先生做的不太一样,他们的研究是基于资料系统上的研究。为什么我们要做资料系统的收集和整理?就是因为我们去很多国家,发现在中国口述历史的资料收集非常薄弱,没有人重视,因为这个东西换不来现钱,所以就没有人愿意做。

有很多事情都非常刺激我,比如我到日本,在日本NHK电视台,它可以让你调有关中国的任何资料,比如九一八、一二八等等,在日本你可以随便说出一个事件,或者说出一个人名、一个时间,它都可以访问,所有的历史都调出来给你看。我在日本的书店里看到一面墙的中国少数民族史,都是日本的学者写的。那个时候我们就觉得非常汗颜,作为一个中国人非常汗颜,

自己人对历史都没有研究。我们口述历史研究中心建立了以后,接待了十几个国家的学者到这儿来采访,有一个德国人说,如果你要看中国的资料,可以到我们德国去看。我说有多少,他说有一鸟巢。这是他的原话,就是能把鸟巢的体育场都装满了这么多。

在南非,口述历史研究中心叫人民记忆中心,在英国,佣人也有自己的口述历史。我刚去了新加坡,新加坡现在的口述历史项目是做华人进入新加坡的历史和原住民在新加坡的发展历史,分门别类做得非常细。回到自己的祖国就觉得口述历史还是没有受到重视,很冷门。

崔永元:我们的口号是“和时间赛跑”



崔永元:我和我的团队现在主要是做资料收集,我们的口号叫“和时间赛跑”,因为我们采访的老人平均年龄是85岁以上,现在已经采访了4000多位。我们最近正在做一个精确的统计,曾经接受采访的老人差不多应该有1000多个已经离开了。最后的采访结束没多长时间,不到一个月就离开了,但是他们在生前留下了最珍贵的口述历史资料。采访这些老人不是很容易,他们经历过那么多运动,有时候会不敢张嘴,他们要下很大的决心才敢面对镜头,说出自己经历的一切,而且他们身体状况不是太好,所以他们每次可能只能和我们谈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小时。像张新,我们叫他摄制记者,就会带着摄制团队和他们吃在一起,住在一起,一个老人有时候要访两个月到三个月。

有的老人我们做他的工作,希望他接受我们的采访,就这一件事要做两年。比如前不久刚刚去世的著名作家梅娘,我们做了两年的工作,她才同意接受我们的采访。刚才跟沈先生交流的时候,他说为什么你们不出书,为什么你们不出一些读物让大家看一看?我说我们的团队现在一是没有时间,第二也没有能力。我和我的团队更像一个拓荒者,我们现在是把有用

的、有价值的口述历史资料,都收集起来,供后人去研究,也许50年以后才有用,也许100年以后才有用。那个时候的中国,大家对钱不那么在意了,对权也不那么在意了,对色可能还很在意,但是已经有足够的时间静下心来,坐在书桌前去研究口述历史了。但是那部分人,值得研究的人都离开我们了,那个时候,你们可以到崔永元口述历史研究中心的资料库来看一看,我们留下了一个千百年后还可以和后人用心对话的机会。

沈志华:很多重要的历史事件没有档案记录

沈志华:听了小崔一番话,其实这个话题很沉重,我听着是话题真的挺沉重,因为我们做历史的,我原来说过一句话,做历史研究的,其实史料就是粮食,没有粮食你怎么做这顿饭?我们讲历史研究,都要用第一手的资料。第一手的资料有三大类,第一类是档案文献,就是当时留下来的一些文件、报告、决议等等,然后收入档案里看,这叫档案文献。第二类就是当事人的回忆,当事人经历的事情,不管是采访的也

好,还是他写的回忆录,这都是当事人的记忆。第三类就是当时的新闻、报刊、或者现在有影视,将来留下来的历史作为史料。

这三类其实缺一不可。你在研究历史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当然档案是最重要的,因为档案讲了整个历史过程背后的运作,怎么运作,怎么决定的这些事情。但是档案有几个缺陷,第一档案是个死东西,你怎么,你看完之后怎么理解,每个人的解读不一样,这个需要什么来补充呢?就是口述史,比如毛泽东和邓小平谈话,你看那个文字的记载,大概能知道一些事情,但是毛主席当时的口气,他当时想说什么,有时候你光看档案,不大看得出来。

比如赫鲁晓夫从美国来,到中国见毛泽东的时候,毛说:你是做什么来的?他说:美国总统让我带句话给你,就是跟美国建立联盟什么的。毛主席一听,说:那么你是做美国的说客了?他说:是啊是啊!你看那个文字,看不大明白,可是你要是采访当日在的人,当时的环境下,你就知道毛主席其实是在讽刺他:你是给美国人当说客的吗?赫鲁晓夫他没听懂,他说是啊是啊。所以我讲这个例子就是,口述史能够还原当时的场景。你读了档案,再看当事人的

记忆,就会对文献有更深刻的理解。

第二个很重要的就是,档案经常没有记载一些东西,特别是像苏联的、中俄的,包括咱们说的朝鲜战争,当时没记载,比如说中共中央几次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记载都没有,我们搞了多少次了,我跟陈兼跑中央档案馆不知道跑了多少次,最后就弄出一张纸,一份文件,就是11月2号没有发出去的那封电报。

实际上很多重要的会议,特别是解放初期的会议,是没有记录的,10月4号政治局扩大会议,10月5号政治局扩大会议,13号政治局扩大会议,17号的会议都没记录,但这四次会议决定了中国出兵朝鲜。为什么要出兵?相互之间的讨论争论,毛主席在会上是怎么说的,没有一个字的记载。现在我们能看到的就是当事人的回忆,所以口述史能够补充档案文献之不足。

当然口述史也有它的缺陷,做研究不能光看口述,因为口述史有几个特点:第一个,它是很具体的事情,每一个人参加的、经历的事情都不一样,你可能采访一百个、甚至一千个志愿军战士,也不一定能了解朝鲜战争到底为什么爆发,因为他只知道他在的那个连队,或者那个

团、那个师的情况。就是13兵团的司令、副司令,他也不了解当时的情况,他不清楚整个的国际背景。所以你单纯弄这个不行,你必须得把口述历史和档案文献结合起来,这样才是真正的历史。在这方面,我先推荐一位人,李丹慧同志在我们华东师范大学冷战国际史研究中心办了一个刊物,我们叫《冷战国际史研究》,和其他的学术杂志不太一样的地方就是,我们用了大量的篇幅刊登大量文献和口述史料,关于朝鲜战争中美国、中俄、韩国和朝鲜四个国家的当事人的口述史。我们现在让李丹慧同志介绍介绍她的经验。

李丹慧:这个不是你们两个先华山论剑,一个中一个美嘛,然后我们两个再谈这个口述史,是不是?

崔永元:沈先生知道他的主要对手是谁。

李丹慧:不是,他主要是觉得陈兼太难对付,所以他要好好琢磨琢磨,让我先来抵挡一下。我现在是华东师范大学冷战国际史研究中心的教授,我还主编《冷战国际史研究》杂志。这本杂志从第七辑开始发关于朝鲜战争的口述历史资料。

第一批是发的一个美国教授的文章,他叫

李小兵,他在美国做的口述历史项目,他花了大概五年时间,采访了美国、中国、韩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大概七个国家过去参加过朝鲜战争的老兵,然后把它们整理出来,编辑出版。他给了我一些稿子,我选了一些,在这本杂志上连载了两期。这本杂志还发表了第二批材料,我们华东师范大学冷战国际史研究中心的一个博士生在美国做研究的时候,采访了美国的几个老兵,这几个老兵,有的是战俘营的,他了解中国战俘的情况。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是,我们延边博物馆的一个研究馆员叫徐龙男,他做了一个项目,这个项目是采访中国人民解放军里入朝作战的朝鲜族军人,大概采访了500多人。

刚才我说的美国的教授李小兵采访的是300多人,徐龙男采访了500多个这种朝鲜族的老战士,大概整理出来的有15万字,现在不算多,15万字的口述历史材料。这是涉及到朝鲜战争的。这个杂志还有其他的口述历史材料。等会我会抽一些时间来介绍其中一些非常有意思的情节,而且也很有价值。

沈志华:我知道咱们在座的特别关心一个问题,就是这场战争对中国来讲究竟意味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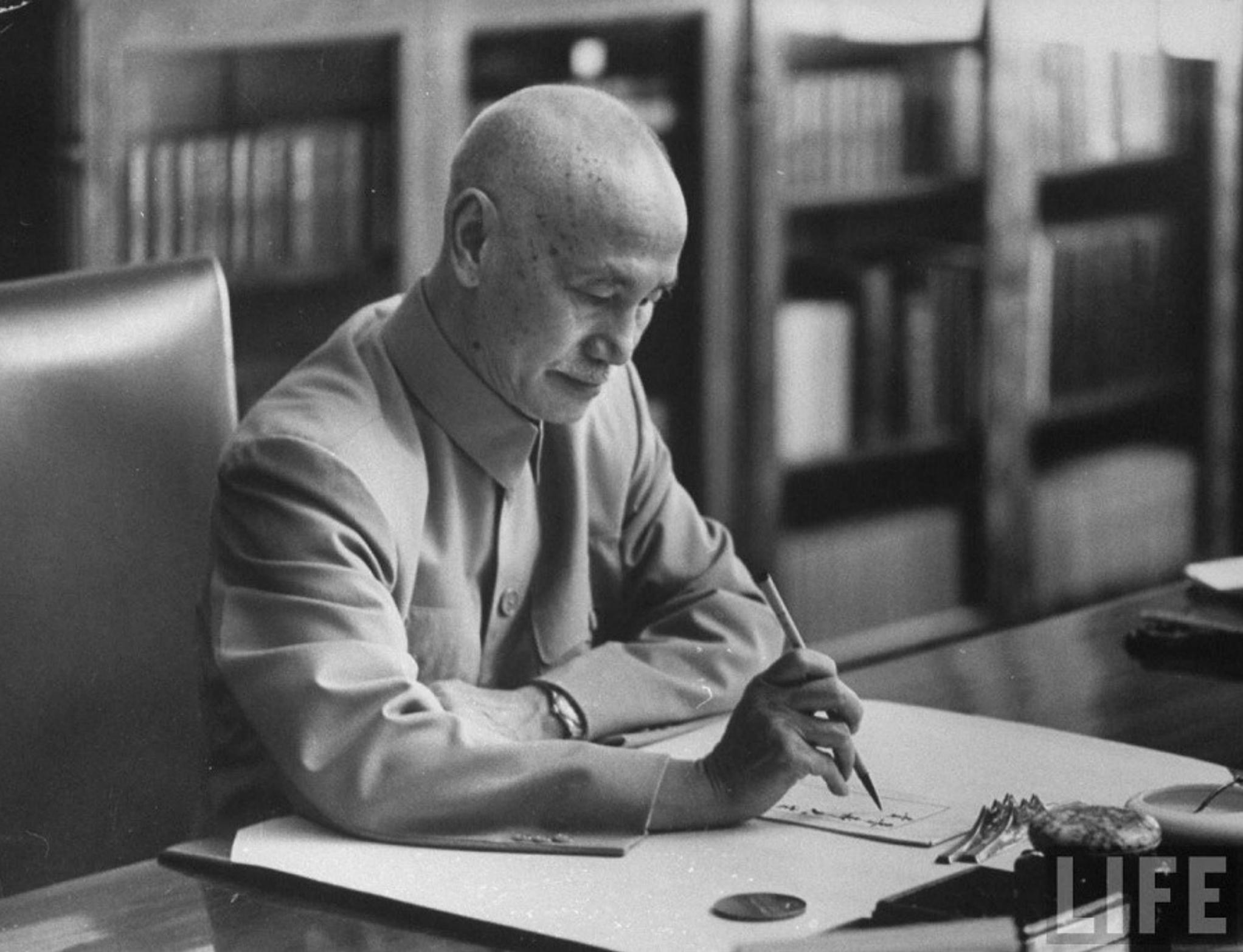
什么,或者换句话说,中国到底应该不应该出兵?中国参与这场战争的幕后的历史到底是什么?我们先请美国人谈,看看美国人当时怎么看这个事,现在因为美国的档案比中国早解密了25年,美国关于朝鲜战争的档案是1975年开始解密的,所以那个时候美国人就开始研究这个问题。但是关于中国出兵原因的真正研究,大概跟中国是同步的,因为他要依靠中国或者是俄国的档案文献,这都是90年代初开始的解密的。

(节选,阅读全文版请关注九州读书会微信号)



“读·享·团”简介:

“读·享·团”是九州出版社主办的官方读书会,以好书分享为主旨,邀请学者、名家进行读书沙龙讲座为主要活动形式,介绍好书,交流思想,倡导独立思考,不定期举办。我们会将最新活动通知,活动现场文字、图片、视频资料通过邮件的形式与会员分享,并会有不定期赠书活动。享受阅读、分享智慧,扫描二维码,一起加入九州读书会吧!



杨天石:不只凭蒋日记 写近代史

作者:特约撰稿 牟尼 来源:法治周末

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著名学者杨天石研究蒋介石多年且有多部专著面世。近年来,他数次远赴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查阅蒋介石……

用多方史料研究蒋介石



法治周末：《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还原13个历史真相》是你解读蒋介石日记系列的第三本书。关于你的研究有一个特别有趣的现象：你做蒋介石研究，内地学者说你想替蒋介石翻案；而长期厌恶蒋介石并一直保持批判的台湾学者汪荣祖对你的研究似乎也有情绪化的反应，为什么？

杨天石：不瞒你说，汪荣祖是我的老朋友。我跟汪荣祖成为很好的朋友是因为在戊戌变法这个问题上我和他的观点是一致的。后来，李敖和汪荣祖要合作写《蒋介石评传》，邀请我参加，两岸各一个作者，加上在美国执教的汪荣祖，这是一个创举，所以我欣然同意。

但在我还在看材料的时候，他们两个已经开始写作了。后来有台湾朋友说，你们合作不

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著名学者杨天石研究蒋介石多年且有多部专著面世。近年来，他数次远赴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查阅蒋介石日记，并出版了《找寻真实的蒋介石》之一、之二。

最近，《找寻真实的蒋介石》之三由九州出版社出版。而他对蒋介石的研究，也遭到了台湾学者汪荣祖以及内地学者的质疑。杨天石为什么会受到海峡两岸学者的质疑？他是怎样利用蒋介石日记做研究的？除了日记之外，他还利用了哪些资料？带着这些问题，法治周末近日采访了杨天石。

成,因为你们的观点不一致。李敖是彻底的反蒋派。李敖和汪荣祖合作的《蒋介石评传》中有一个序言,有一句话说:蒋介石关了我好多年,现在他死了,该是我报仇的时候了。所以,李敖的书是一个报仇之作。也因此他们的书出了,我的《蒋介石传》到现在还没有动手。

法治周末:内地有学者质疑称,你是单靠蒋的日记做研究。对此,你怎么看?

杨天石:内地有学者认为我吹捧蒋介石,没有别的根据,只相信蒋的日记,单凭蒋的日记来写历史、做研究。也有学者不点名批评说:“还有学者在美国看到了蒋介石日记,就认为可以据此认识一个真实的蒋介石,甚至据此可以重写中国近代史。”

实情并非如此,我认为这是误解。我只尽可能地讲史实,不轻易地给别人戴高帽子。一个现实情况是,大部分台湾学者支持我的观点,而且台湾还有学者说,我的蒋介石研究对于促进两岸的关系改善有功。我的书两岸大多数的读者都能接受,这是我高兴的一件事。我觉得我替两岸关系的改善做了一点小小的、有益的工作——不是加深这个对立,而是促进彼此的了解。

汪荣祖教授,我是觉得他的弱点是受了李敖的影响,容不得别人说蒋还有某些功劳。他曾经和李敖有过一个讨论,蒋到底有没有做过一件好事?结果他们俩找了半天,结论是没有做过任何一件好事。

所以我觉得历史学家第一要中立,第二要客观,如果把个人的感情色彩掺杂进去,你就很容易脱离了一个历史学家应该有的公正客观的立场。

法治周末:那么,在对蒋介石的日记辨伪和考证、考据的方面,你做了哪些工作?

杨天石:蒋的日记生前没有发表过,到现在也没发表,而且也不打算发表。这至少排除了利用日记来欺骗百姓、自我标榜的可能。所以,我第一个看法就是,蒋的日记有相当大的真实性。但是,蒋的日记也不是事事可信。有的事情他不记,有的事情是按照他个人的感情色彩、个人的好恶来记的,有片面性。另外,也有许多错误、不正确的东西。

我在研究工作中讲过两句话,研究近代史不看蒋的日记是很大的不足,但是什么话都信也会上当受骗。

法治周末:阅读蒋介石日记,有没有一种

让你上当受骗的地方？

杨天石：有。我只需要举一个例子，1938年，汪精卫从重庆逃到越南的河内，想投降日本。蒋就劝汪精卫，别去跟日本人联系，劝他到欧洲去休养，并派人把护照和美元送到河内。

但是，这以后发生了河内刺汪未成事件。蒋的日记对此记载了8个字：“刺汪未中，不幸之幸。”我看到这个日记就很纳闷，为什么是“不幸之幸”？蒋介石为什么这么写？这个问题多年以来我一直在思考。

我以为，这是蒋为了把自己塑造成一个崇高的道德形象。为什么呢？因为汪毕竟是孙中山的战友，曾经是国民党的一把手，而且之前蒋介石是让他到欧洲去休养，却突然派特务去把他刺死，这显得你蒋介石第一无情无义，第二用暗杀手段太卑鄙了。

所以，蒋介石要写这么四个字，表明不是他下的命令。这样有什么好处呢？为了身后名。生前的名他没考虑，因为他日记不想公布，但是死后这个日记会流传下来，人们会研究他的日记写历史。这是我多年来思考这个问题的结论，对不对还有待于讨论。

多年来，我在讲蒋的日记时常常讲蒋的日记局限性。

法治周末：到目前为止，在你几十年的蒋介石研究中，除了蒋介石日记之外，你还参照了哪些材料？你怎么样辨别和利用这些材料？

杨天石：我只需要举一个例子，这也是大家不知道的，就是德国和日本在二战中，有一个在印度会师的计划。德国人拉拢蒋介石，派人跟蒋介石在欧洲的代表桂永清（当时中国驻德国的参赞）谈判，要求中国和德国合作，定一个条约叫“中德军事协定”。协定的主要内容是东西夹击，最终让德国军队和日本军队在印度会师。蒋介石说，这个事情要坚决拒绝。

对这件事，我查看了哪些东西呢？第一，德国人把蒋拉过来，和德国配合进攻印度，这个计划我怎么知道的？我是在美国存的档案里查到的。谭延闿的儿子谭伯羽给宋子文发的电报讲了这个计划，最后一句说“委员长还没有答复”。我看到这个电报以后就觉得这个问题很重要，一定要查清楚。所以第二步我就查蒋的日记，大概是1942年6月18日的日记，蒋有一段话讲，桂永清这个人不懂外交，他不能够担负和德国人谈判的任务，要告诉他坚决拒绝德国

人的要求。

然后我又查到了陈布雷给桂永清的一个电报,说这个事情不能谈,坚决拒绝。接着我查了陈布雷的日记,证明是蒋让陈布雷替他打一个电报,告诉桂永清说,拒绝这个事情。

但是,电报有没有假冒的可能?我又查陈布雷日记,6月19日的日记中有一句话:“今天下午致桂永清一电。”应该说这个事情已经很清楚了。但我还查了德军一个叫哈尔德参谋长的回忆录。他的书里讲得很清楚,确实有此计划。然后我再查日本方面材料、印度方面的材料,都证明有这个计划。

所以,为了这一篇文章,我看了美国方面保存的谭延闿儿子的电报,看了台湾国民党的档案,看了陈布雷的日记,看了德国、日本、印度外交官的回忆,最后把这个问题定下来了。

这些材料形成了《找寻真实的蒋介石》第二集里面所写的那篇文章。所以说,我有时候很委屈,有一点心酸,我明明看了那么多档案,美国的、台湾的、日本的等我都查了,还说我只凭日记写近代史。



国共谈判：蒋想一党专政、 个人独裁

法治周末：本书第二篇是讲国共谈判的，美国和苏联出于各自的利益也在背后较劲。而且蒋显然是不愿意放弃独裁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这种和谈其实几乎没有成功的可能性。

杨天石：可以说双方当时是一个不共戴天的情况，彼此都要用武力解决，这是个基本的态势。但是，双方又确实有若干谈判，而且在谈判中，中共方面做了很大的让步。

为什么会有双方虽然彼此都要打，却认认真真在谈的情况？美苏两国在后面起了作用，美国在抗战期间的政策是希望国共合作，共同打日本，这符合美国利益，所以要调解双方的矛盾。战后美国扶持蒋介石，继续防止日本在远

东崛起,所以美国的政策是扶持国民政府、扶持蒋介石。

从苏联来说,它也不愿意国共再战。当然,苏联的态度在当时很复杂。

法治周末:这里面透露的蒋介石的态度也是很有意思,开始他极力想达成和解,协议达成之后又有反弹。

杨天石:国共两方合作条约是毛泽东起草的,毛泽东首先签字。我这里有一张插图,你看上面毛是用毛笔签的,美国人也签了,但是蒋介石不签,蒋介石为什么不签呢?蒋是要维持一党专政的,要搞联合政府,一党专政就不可能了。

法治周末:实际还是要维持他自己个人的权力。

杨天石:他想一党专政、个人独裁,蒋是很重视这个权力的。

蒋有一段时期为什么让胡适出来当总统,我们都以为是蒋在演戏,假的。但是我的研究结果不是这样,蒋是确实不想当。为什么不想当呢?因为之前政治协商会议有个决议,宪法要改成总统虚位制——就是总统名义上很光荣,是最高领袖,代表国家,但是总统没有实

权。权力在行政院长手上,也就是把总统架空了。对这个修改原则,周恩来、毛泽东满意,民主党派满意,美国人也满意。

但蒋介石不满意。所以蒋介石就想干脆把这个无权总统让胡适去干吧。蒋有两个选择,第一是当总参谋长,第二是当行政院长。但蒋想把总统交给胡适,国民党不干,国民党觉得胡适是非党人士,怎么能当国家元首,所以非要蒋当总统不可。但是蒋又不想当,最后只好搞了一个临时条例,临时条例主要的作用就是增加总统的权力,蒋介石觉得总统有味了,那就当吧。

蒋介石反腐败：日记反贪

法治周末:蒋以曾国藩为榜样,反腐败时,他枪毙了孔祥熙的亲信。他为了反腐败,派出蒋经国去上海“打虎”。他一直有心去反腐败,但实际情形是,国民党从抗战胜利后,就开始了整体性的腐败,你觉得这里面的原因是什么?

杨天石:现在有读者批评我说,蒋介石是日记强国,就是蒋介石在日记里说空话,说蒋介石日记抗日,这个观点我不同意。

但是,蒋介石确实有这个情况:日记反贪。蒋在抗战期间确实想反贪,因为贪污对他的统治不利。而且他把孔祥熙的亲信枪毙了,孔祥熙说情也不管用。

他为什么反不彻底呢?他靠他个人的力量,靠他个人所见所闻,这是反不掉蔓延广大的贪污现象的。到了抗战胜利以后,蒋介石也未尝不想反贪污,他也想了好多办法。譬如,第一,他开展一个反对贪污运动;第二,他要求每个党员要登记财产,拒绝登记开除党籍,这个力度不能说不大;第三,他还提倡勤俭节约,他成立了一个勤俭报国会,反对社会上的奢侈、奢靡之风。

但是,实际上他的反贪都停留在他的日记里边,都停留在决议里边,停留在文件里边,他没有踏踏实实地把它兑现在实际行动里边。也就是说贪腐现象你在日记里反在纸面上反,在决议里反,这是反不掉的。

法治周末:有人说,当时孔令侃的那些物资实际上是合法的,因为他确实去登记了,蒋经国是“黑打”。你觉得对吗?

杨天石:我对蒋经国打虎失败的研究结论,台湾学者表示不同意,内地也有学者表示不

同意。台湾学者和内地学者有一个基本观点就是孔令侃没有违法,他仓库里都是生活日常用品。说他没有违法,而且是登记过的。

我就问他们,你们根据什么说孔令侃没有违法?这是不可想象的。我建议他们去看一看当年国民党检察院的调查报告,当年检察院调查时蒋介石不让调查。尽管蒋介石不让调查,但是检察院还是讲了好多事实。此外,还有上海市政府的处理意见。

我的结论是,孔令侃确有违法行为,蒋介石也确有包庇行为。

法治周末:这件事造成了很严重的后果,舆论反映非常大,全国上下一片哗然,大家都骂蒋介石、宋美龄包庇自己的亲戚,包括傅作义等将领。

杨天石:这件事,把老百姓对国民党最后一线希望给破坏了。本来大家把希望寄托在蒋经国身上,蒋经国失败了,国民党还有什么希望?没希望。所以,殷海光在国民党党报《中央日报》上写了评论《赶快收拾人心》。贪腐可以亡政,本来贪腐就很难根除,你再有明显的包庇行为摆在大家面前,大家当然对你失望。

法治周末:看你的书当时还有一个想法,

因为国民党全面的腐败是从日本人投降之后开始的。这是否可以说,蒋介石对反腐失败完全缺乏事先的预案?

杨天石:所以,后来蒋检讨时候有这样一条,就是说他没有估计到腐败会那么严重,而且他也没有事先考虑预防方案。当他有所发现的时候,他也没有采取坚强有力的措施。反贪确实很困难,当它已经弥漫的时候是很难解决的。

他当时也想了一些办法,除了前面提到的,还有自力更生运动,但都停留在口头上。国民党本来就是一个很松散的组织,没有执行力,所以蒋介石说他的,下面的官员干自己的。

所以,蒋介石想反也反不了。



林语堂：论躺在床上的妙处

《宇宙风》是为成年读者编的；若为小学生阅看，这种题目，不外“早起早睡，使身体康健”两语足以了之，躺在床上也就没有什么议论可发了。

《宇宙风》是为成年读者编的；若为小学生阅看，这种题目，不外“早起早睡，使身体康健”两语足以了之，躺在床上也就没有什么议论可发了。事实上，躺在床上偏偏是人生之一部，而且人生七十岁，躺床三十五，也就不得不谈，而且甚有可谈，不得以“早起早睡”四字了之，一若躺在床上经过时间，不足一谈也。

我们总是喜欢蒙骗小孩，以“昼寝”为罪恶。实际上与我谈过的医生，银行家，校长，多半认为每日下午昼寝半小时，甚为有裨卫生，且睡起作事精神饱满，较不昼寝者工作成绩加倍。但若以此话向青年言之，仍认为不合，是故中国部长院长校长人人实行昼寝，而人人戴上不昼寝之假面具，即使密友闲谈可以承认，而著之文章断断不许，于是文章与人生永远隔开，而失其改造人生使思想与人生调和之效用了。

躺在床上于世界文化之功大矣，世人不察耳。据我私见，世界上百分之九十五的重要科学发明莫非得之于卧床上被窝中；惊动世界划分时代的哲学思想也莫非于三更半夜，身卧床上，手执一根香烟时，由哲学家之头脑胚胎出来。由是观之，躺在床上之艺术尚矣哉。

所谓躺在床上者何？不外两种意义，一为身体上的，一为精神上的。由身体上言之，躺在床上是我们摒弃外物，退居房中，而取最合于思省的一种姿势。若要思省得好，这姿势不可不讲求的。

孔子就是很懂得“人生的艺术”的人，就是人生的艺术家——必有寝衣长一身又半，以防脚冷，此皆后世儒家所不屑谈的了，虽然在孔子，这已成为“必有”的条件。所以如此，也只不过求其舒服而已。孔子的姿势是好的，对的，因为他是侧身而卧。所谓“寝不尸”，是不要强使本来曲折的脊梁拉成直线，以致筋肉长持紧张的态度，这是“合乎近代科学的发明”的。

在我想，人生真正享福之事，无多，而跷起足弯卧在床上居其一。全身躺直就无味了。手臂的位置，也须讲究。少读孔子所称“曲肱而枕”之乐，觉得难解，现在才知曲肱之趣，假如垫以大软枕头。我认为最好的姿势是弯着一腿或两腿，一手或两手放在头后，垫以枕头，使身体与床铺成三十角度之势。在这种姿势之下，诗人自然得了佳句，科学家自然发明新理，而哲学家也自然可以想出惊天动地的思想了。

世人平常都是无事忙。一天不知所忙何事，晨起夜睡，胡涂过去，少作曾子所谓三省，及君子慎思的工作。所谓卧床的艺术，不是单指身体上的休息而言。自然，躺在床上，身体得着休息，日间规劝你的哥哥姐姐，电话上无礼的陌生人，好意来探访你及一切使你身疲力乏的人，现在也都攒在被窝中，而你得自由解放了。但这些以外，还有精神上的意义。

假定躺的好，这床上的时间，就是你深自检点，思前虑后继往开来的宝贵时间。许多商业

中人,每以事业繁忙自豪,案上三架电话机拨个不停,才叫做成功。殊不知他们若肯每天晚点起来,多躺一个钟头,反可以想到远者大者,牟利可以加倍。就使躺到八点九点起来,有何妨?

在未起床之前,他的头脑是清楚的,他卧在被窝中,床旁一盒香烟,颈上无狗领,腰上无皮带,足上无皮鞋,足趾仍然自由开放,他可以盘算一下,追思前日作事之成绩及错误,及拣定今日工作之要点,去其繁琐,取其精要——这样才徐徐起来漱口,十点上办公室,胸有成竹,比起那些无事忙先生,危危岌岌九点或八点三刻就到公事房呼喝下辈,监督职员,岂不高一筹吗?商家常骂文人“幻想幻想”,其实眼光远大的商人,才需要幻想。要学习幻想,就得床上多躺一会儿。

至于文人,发明家,思想家,躺在床上之重要更不必提了。文人清晨静卧床上一小时得来奇思妙想,比之早晚硬着屁股,坐冷板凳,推敲字句,苦索枯肠,其功奚啻数十倍?当他在床上心血来潮,静卧思摩玩味人生之一切时,他的幻想力既极强健,而他所观察的人世,也似脱去层皮毛,现出真相,如中国画家所言,于物之形似之外,探其义理,再加以作家胸中之意,自然画出的山水人物,异乎日间所见的自然而更神似自然了。

所以如此者,是因为当我们躺在床上之

时,一切肌肉在休息状态,血脉呼吸也归平稳了,五官神经也静止了,由了这身体上的静寂,使心灵更能聚精会神,不为外物所扰,所以无论是思想,是官觉,都比日间格外灵敏。即以耳官而论,也是此时最聪敏的。凡好的音乐,都应取躺卧的姿势,闭着眼去详细领略。李笠翁早已在论“柳”一篇说过,闻鸟宜于清晨静卧之时。假如我们能利用清晨,细听天中的音乐,福分真不小啊!

上海近郊的鸟声,很少听见人谈起,也许就很少人去领略。今天早晨,我五点半就醒,躺在床上听见最可喜的空中音乐。起初是听见各工厂的汽笛而醒,笛声高低大小长短不一。(在此应补一句“我马上想到厂工之苦及资本主义之压迫”为得体时文应有之义。)过一会儿,是远处传来愚园路上的马蹄声,大约是外国骑兵早操经过。



(图片来源:佛山摄友会上传者忠哥88)

在晨光熹微的静寂中,听马蹄滴笃,比听什么音乐合奏还有味道。再过一会,便有三五声的鸟唱。可惜我对于鸟声向来不曾研究,不辨其为何鸟,但仍不失闻鸟之乐。

今年春天,我最享乐的,就是听见一种鸟声,与我幼时在南方山中所听相似,土名为Kachui,大概就是鸠鸟。他的唱调有四音——do, mi, re-ti, 头二音合一拍,第三音长二拍半,而在半拍之中转入一简短的低阶的ti(第四音)——第四音简短停顿的最妙。这样连环四音续唱,就成一极美的音调,又是宿在高树上,在空中传一绝响,尤为动人。最妙者,是近地一鸠叫三五声,百步外树杪就传来另一鸠鸟的应声,这自然是雌雄的唱和,为一切诗歌的原始。这样唱和了一会,那边不和了,这边心里就着急,调就变了,拍节加快,而将尾音省去,只成do, mi, re 三音,到了最后无聊,才归静止,过一会再来。

这鸠鸟的清唱,在各种鸟声中最美而留给我最深的印象。此外倒有不少,如鹊鸟,如黄鹂,如啄木,声皆近于剥啄粗野,独邻家鸽子的呜呜特别温柔,代表闺房之乐,属于周南一派。雀声来得较迟,就是因为醒得较迟,其理由不外如笠翁所指出。别的鸟最怕人,我们这最可恶的人类一醒,不是枪弹,就是扔石,一天不得清静,所以连唱都不能从容了之,尽其能事了。故日间吟唱,其唱不佳。为此又好早点

起来清唱。惟有雀,既不怕人,也就无妨从容多眠一会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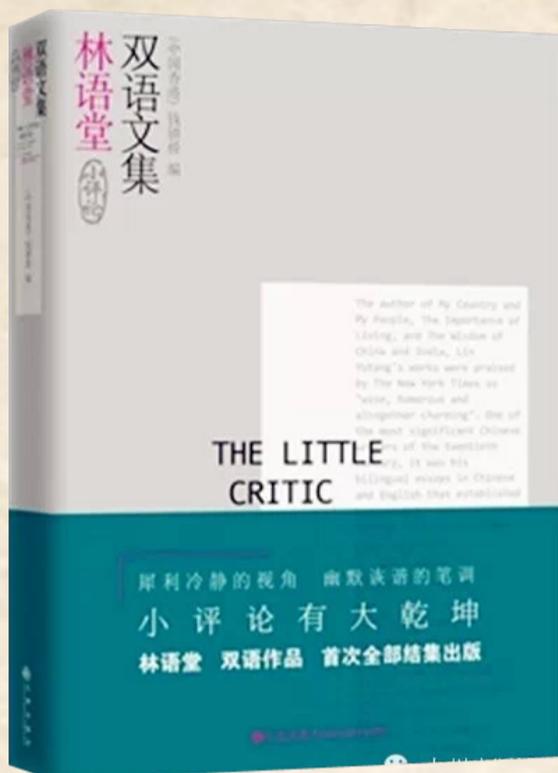
自然鸟声以外,还有别种声音。五点半就有邻家西崽叩后门声,大概是一夜眠花宿柳回来。隔弄有清道夫竹帚扫弄沙沙的声音。忽然间,天中两声“工——当”飞雁的声音由空中传过。六时二十五分,远地有沪杭甬火车到西站的机器隆隆的声音,加上一两声的鸣笛。隔壁小孩房中也有声响了。

这时各家由梦乡相继回来,夜的静寂慢慢消逝,日间外头各种人类动作的混合声慢慢增高,慢慢宏亮起来。楼下佣人也起来了。有开窗声,钩钩声,一两咳嗽声,轻微脚步声,端放杯盘声。忽然间,隔房小孩叫“妈妈!”这是我清晨所听的音乐。

JZHPRESS,悦读九州

本文选摘自《小评论:林语堂双语文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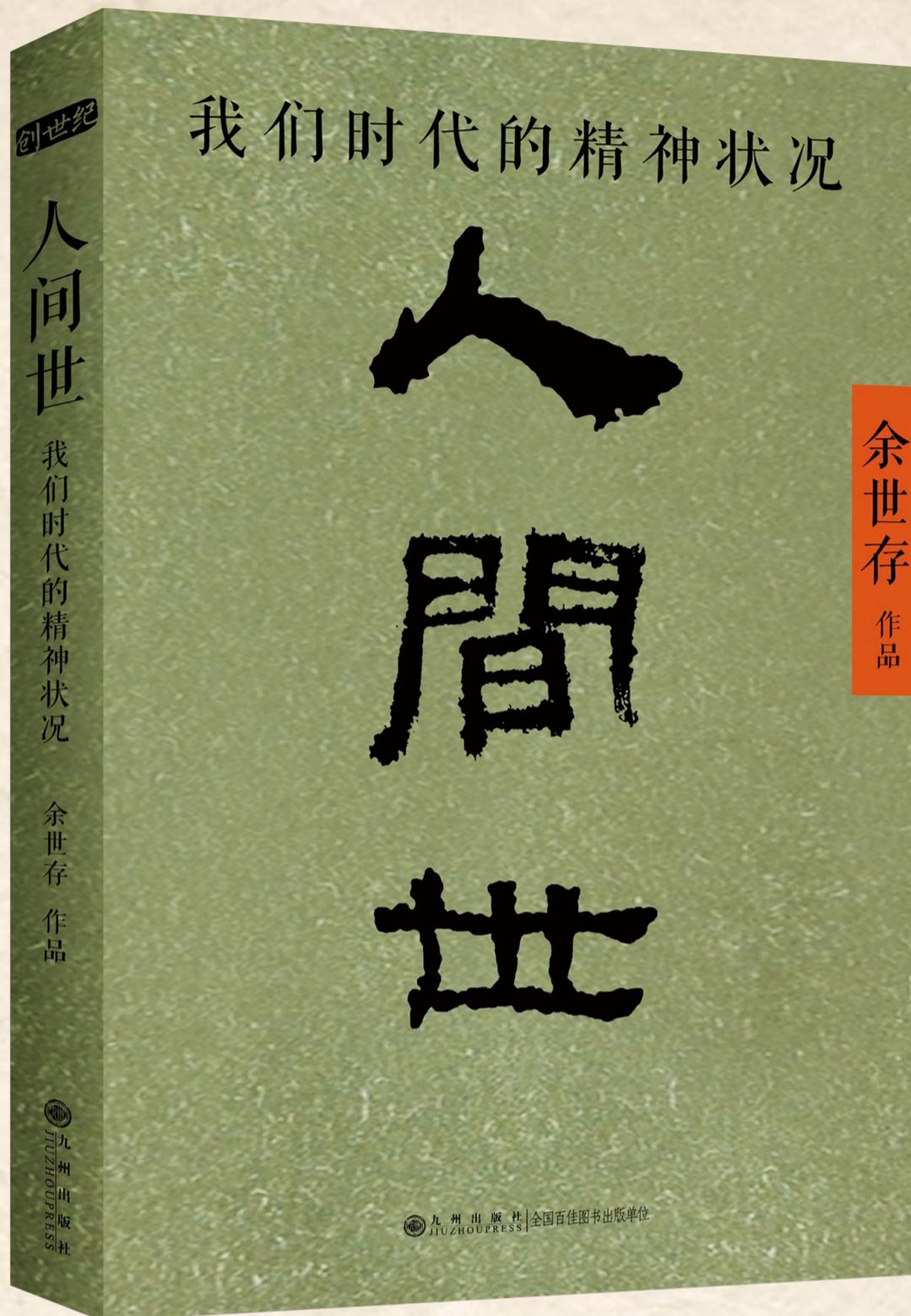
九州出版社出版



内容简介：

20世纪30年代,林语堂以英文著作《吾国与吾民》、《生活的艺术》、《中国印度之智慧》扬名世界,《纽约时报》称他的作品“智性、幽默、充满魅力”。林语堂毕生从事双语写作,穿梭于中西文化之间,却很少有人将他的双语作品对照来看。

钱锁桥编著的《小评论:林语堂双语文集》集收录了五十对林氏写于1930-1936年间的双语作品,这些作品并非简单的翻译,而是针对不同读者和语境的再创作。对照来看,林氏作品中一贯的生动、智慧、洞察、黑色幽默。自成景观。本书收入了目翦所能找到的全部林语堂双语作品,是林语堂双语作品首次全部结集出版。



管窥世象，蠡测人性

——读余世存《人间世》

◎胡飞雪

余世存先生是我们时代的观察者、思考者。读他的书，如翻山越岭，横看、竖看，或岭、或峰，或丘、或壑，皆是景致，皆有妙趣，皆见美理。

余世存先生是我们时代的观察者、思考者。读他的书,如翻山越岭,横看、竖看,或岭、或峰,或丘、或壑,皆是景致,皆有妙趣,皆见美理。他字斟句酌创作的《人间世》,有独醒,有众惑;有叹息,有赞誉;有幽愤,有尤怨;有棒喝,有澡雪;有照抄照搬,有自铸伟词;有思接千载,有视通万里;有上下求索,有拔剑四顾;有无情解剖他人、解剖自己,也有理性欣赏世情、褒扬人性。

比如,透过“世相”篇,余世存像个神经外科医生无情解剖家庭这个人生最重要的安身立命之所:“我们多愿意跟外人相处,而少有精力跟父母家人相处,以至于再不回家看老人就算违法了。没有两三代人的家庭生活难以说有什么家风家教,我们多是‘失败’的,既没从上一代得到什么教益,也难以向下一代传承自主自信的经验。要命的是,我们很多人对此无知,我们是传统批评所说的缺家教的几代人。”很多人在家里的表现无法叫人恭维,到了社交场所,其表现还是令人失敬:京内京外朋友聚在一起,等饭的时候很安静,大家都在看手机。朋友说,看来服务员只要给大家发图书就可开饭了。大家乐,感慨而又无奈。这种场景司空见惯,而作者却有惊人的发现、发掘:“是的,不管我们多么成功或多有文化,只要在这面对面的交流中无话可说,或只看手机,那不仅是没礼貌,而且参与了技术对生活的绑架……”

论及本书的思想锋芒,笔者最欣赏“读书”篇中的内容:“大脑的读写能力据说是几千年才培养出来的,现在正遭遇挑战。调查者的数据显示,我们每周读印刷品的时间已经可以分钟来计算了。网络世界最不提倡的就是从容、缓慢的阅读、以及全神贯注的思考。网络就是转移注意力的代名词,网络公司是做分心生意的公司,它使大脑成为真正的跑马场,使心思与时浮沉。”想想,当阅读成了据流量计取费用的时候,当阅读成了配合电话运营商完成一单生意的时候,还会剩下什么?

在“权力”篇和“资本”篇,作者对权力和资本的解剖刀刀见血:“在某种意义上,(学生时代的排名次、排座次)这种势力也是一种丛林法则。我国人多终生染上了学生时代的毛病和认同了丛林法则,很少懂得什么是体面和尊敬的人生意义。”在权力导演一切的舞台上,“资本目前仍是以婢女、恶棍和某种福音相混合的形式出现的。它重构了中国,但它还没有魄力和信心表达自己。”“资本在东方已经横行,但它需要一次成人礼:正义它自己。”资本是实物,也是个抽象的东西,它的正邪善恶,取决于主导、使用、掌控它的人。

余先生坦承,他深受南北朝刘义庆《世说新语》熏染,在《人间世》的部分章节里,他只纯粹记录他人的见解看法,如他记录裴敏欣谈中国高等教育,说社会中上层用脚投票,把他们的孩

子送到国外接受高等教育：“对中国的精英阶层来说，把小孩送到北美、欧洲和澳大利亚的高校学习，是一个十分理性的决策。”中国先富起来的家伙们把孩子送到国外，目的多重，绝非仅为教育，狡兔三窟恐怕也是其一；原因也多样，中国大学是把优秀人才招来集中销毁之地恐怕也是其一，所谓“毁人不倦”之说正来源于此也。

在“知识人”篇中，作者写到，他带一年轻人去一作家朋友家里聊天。作家的清贫、高洁、专注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离开后，年轻人一度泫然欲泣：这样的作家为什么不为社会所知。“我安慰说，何世无奇才，遗之在草泽。他和堕落的社会相看两厌，如此才各得其所。”所以在《友朋》篇，作者又记录存在主义大师毛喻原的名言：“在中国，不要成为亲友的包袱，就很了不起了。”独善其身，不牵累亲友，这要求不高，但做到却殊为不易。毛喻原此言足可传之后世。

看得出，从语言、思想到风格，余世存都在继承、发展鲁迅精神。在“罪苦”篇，他便如此不留情面、入木三分地解剖人性：“当代的罪性与道德败坏不仅源于‘平庸的恶’，更源于人性始终无法克服的某种根本性缺陷：人关注自己甚于关注他人，关注身边人甚于关注陌生人，关注现在甚于关注未来。”“人的罪错表面上是因为他的强势或本能，更深刻的原因在于他的

智力弱势、她的无知。但遗憾的是，由于我们不习惯开智启蒙，坏人几乎不知道自己是坏人，一如愚人不知道自己的愚；人生社会于他们毫无经验教训。我们常常以为这个人坏过了，蠢过了，该变好、明智一些，结果他的行为更坏、更蠢。”在《退化》篇，作者还说：“社会生活或者长时间疲软无趣，或者热闹一时，高潮迭起，其精彩让人目瞪口呆，大跌眼镜，连声感叹超出想象力。人们的生活就是等待、观看弄潮儿们的表演。人们以为他们有着正常的人性和思维，但他们多有匪夷所思的贪婪、残忍和恶意。我们如不能以最大的恶意揣测他们，监督他们，也应该努力做一个有尊严的观众。”

在“坎陷”篇，他既说：“我们的精英和中产阶级，能用脚投票的多到海外找后路了；但我希望大家能一起建设好自己的园地。”又说：“有时候，人生社会的正义是以退场或不在场来表达的；在我们社会里，这更应成为文化人的常识。那些上场标榜自己在表现良知正义乃至艺术的艺术家的，那些占位五年十年之久的艺术家，虽然博得一时的热闹分得社会的红利，但他们把自己置于可笑可悲的境地：他们是不义的。”我以为，余先生在这里抨击的艺术家，应理解为有所特指，有些艺术家在特殊历史时期身不由己，如童祥苓，文革中以“戴罪之身”饰演英雄杨子荣，唱念做打，英姿毕现，而文革后，不仅下了岗，两个儿子也受牵累。这样的人是只宜给以同情，不宜给以责难的。



钱穆：我的一生

我平生自幼至老，只是就性之所近为学。自问我一生内心只是尊崇孔子，但亦只从《论语》所言学做人之道，而不是从孔子《春秋》立志要成为一史学家。

我平生自幼至老，只是就性之所近为学。自问我一生内心只是尊崇孔子，但亦只从《论语》所言学做人之道，而不是从孔子《春秋》立志要成为一史学家。

古代中国学术界亦尚未有专门“史学”一名称。西汉太史公司马迁写《史记》时，亦只见其尊孔之意。我之爱读《史记》，主要亦在此。非专为有志如近人所谓成为一史学专家，亦非专为有志如近人所谓之治文学。只是生性所好，求为一“学而时习之”之平常人而已。

我生平做学问，可说最不敢爱时髦或出风头，不敢仰慕追随时代潮流，只是己性所近，从其所好而已。我到今也常劝我的学生，千万不要做一时髦人物。世局有变，时代亦在变，三年五年，十年八年，天地变，时髦的亦就不时髦了。所以不学时髦的人，可不求一时群众所谓的成功，但在他一己亦无所谓失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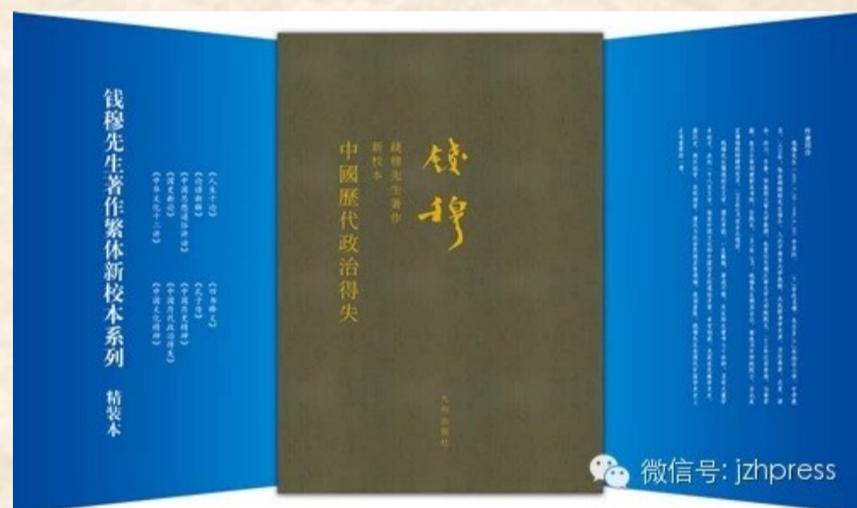


我一生最信守《论语》第一章孔子的三句话：“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这是教我们一个人的做人之道，亦即是教我们做学

问的最大纲领。

我自七岁起，无一日不读书。我今年九十三岁了，十年前眼睛看不见了，但仍每日求有所闻。我脑子里心向往之的，可说只在孔子一人，我也只是在想从《论语》学孔子为人千万中之一二而已。别人反对我，冷落我，我也不在意。我只不情愿做一孔子《论语》中所谓的小人，“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中国传统上做学问要讲“通”，我不是专研究想要学近代人所谓的一文学专家或史学专家。亦可说，我只求学在大群中做一“人”，如中国传统之儒学子学，至于其他如文学史学亦都得相通。



如我的《先秦诸子系年》是讲的了学，非专为史学，但与史学相通。我写此书是因我在中学教书，学校规定每位国文教师除教国文课外，另需开《论语》《孟子》、国学概论三门课。

那年我教《孟子》，《孟子》第一篇讲到孟子见梁惠王，这事发生在梁惠王的哪一年？自古以来成一大问题。我为考订此事，于是启发了

我写《先秦诸子系年》这部书的最先动机。

后来如我写《国史大纲》，乃是一本上堂讲过七年的教科书。那时我做学问的主要兴趣，只注意在中国史方面。以后我的注意又逐渐转移到世界各民族的文化问题上去，我的主要兴趣转到文化比较上，但亦都为解答我自己一人心中的问题。



(1931年 钱穆在课堂上)

就我一生读书为学的心得，我认为根据中国历史传统实际发展的过程看，自古以来学术思想是居于人生一切主导地位的。上之政治领导，下之社会教养，全赖学术思想为主导。

我更认为不仅中国过去如此，将来的中国，亦必然应该要依照传统重振学术才有正当的进程。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各有他自己的套传统文化。看重学术思想之领导，是我们传统文化精神之精华所在，这是不能扬弃的。

看重我们自己的传统文化精神，必需看重儒家思想为之作主要的中心。换句话说，看重

中国历史绵延，即无有不看重儒家思想。儒家思想内在一面有其永不可变的外貌，如修、齐、治、平皆然。另一面亦有其随外面时代需要而变的内在思想，如孔孟程朱皆是。



举个简单的例子，孔孟同属儒家，但孟子思想与孔子亦有所不同。这因时代变，思想亦必然随而变。但在追随时代的不断变化中，有一不可变的传统精神，是我们最该注意的。

今天的世界，交通方便，全世界如一国。我认为儒家对今天以后的中国，仍当有其不可磨灭的贡献。其对世界文化亦自有其应有之影响。至少可以说，对时下世界亦同时有其间接的贡献。

简单的说，我一生读书只是随性所好，以及渐渐演进到为解答在当时外面一般时代的疑问，从没有刻意要研究某一类近代人所谓的专门学问如史学、文学等。这是我一生学习的大纲，亦是我私人一己的意见。

本文选摘自钱穆著《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
之《九十三岁答某杂志问》



内容简介：

《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是钱穆先生值80岁与88岁高龄时写作的，他将自己的家族与一生见闻娓娓道来。

读罢此书，既在平凡的叙述中见到先生的学术传承脉络及思想的变化，并且对当时的一些文人，如熊十力、孟心史、吴晗、傅斯年、冯友兰、梁漱溟等等有一个特别的了解。

如先生自己说的，这本书不光是写他自己一身一家的琐事，更加能启发那些对近当代人文思想感兴趣的“善论世者”。

作者简介：



钱穆先生(1895.7.30-1990.8.30)字宾四，1912年改名穆。先生自1912年始任小学、中学教员。1930年，他由顾颉刚先生推介，入北平燕京大学执教，从此跻身学术界。

历任燕京、北京、清华、四川、齐鲁、西南联大等大学教授，也曾任无锡江南大学文学院院长。1949年迁居香港，与唐君毅、张丕介等创建新亚书院，任院长。1967年10月，钱穆先生移居台北，被选为中研院院士，台北故宫博物院特聘研究员。1990年8月在台北逝世。

钱穆先生博通经史文学，擅长考据，一生勤勉，著述不倦。先生毕生著书七十余种，另有大量学术论文，共约一千八百万字。

他在中国文化和中国历史的通论方面，多有创获，尤其在先秦学术史、秦汉史、两汉经学、宋明理学、清代与近世思想史等领域，造诣甚深。钱穆先生在现代中国学术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

钱穆全集：



《钱穆先生全集》[新校本],在台湾经由钱宾四先生编辑委员会整理编辑而成,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一九九八年以“钱宾四先生全集”为题出版。

作为海峡两岸出版交流中心筹划引进的重要项目,这次出版,对原版本进行了重排新校,订正文中体例、格式、标号、文字等方面存在的疏误。至于钱穆先生全集的内容以及钱宾四先生全集编辑委员会的注解说明等,新校本保留原貌。

《钱穆先生全集》所含书目如下：



第一卷:国学概论

第二卷:四书释义

第三卷:论语文解

第四卷:论语新解

第五卷:孔子与论语

第六卷:孔子传

第七卷:先秦诸子系年

第八卷:墨子惠施公孙龙

第九卷:庄子纂笺

第十卷:庄老通辨

第十一卷: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

第十二卷:宋明理学概述

第十三卷:阳明学述要宋代理学三书随劄

第十四至十八卷:朱子新学案(全五册)

第十九至二十卷: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上、下)

第二十一至三十卷: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全十册)

第三十一卷:中国思想史中国思想通俗讲话

第三十二卷:学龠

第三十三卷:中国学术通义

第三十四卷:现代中国学术论衡

第三十五卷:周公秦汉史

第三十六至三十七卷:国史大纲(上、下)

第三十八卷:中国文化史导论

第三十九卷:中国历史精神

第四十卷:国史新论

第四十一卷: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第四十二卷:中国历史研究法

第四十三卷：中国史学发微读史随劄

第四十四卷：中国史学名著

第四十六、四十七卷：史记地名考

第四十八卷：古史地理论丛

第四十九卷：文化学大义

第五十卷：民族与文化

第五十一卷：中华文化十二讲

第五十二卷：中国文化精神

第五十三卷：湖上闲思录人生十论

第五十四卷：政学私言从中国历史来看中国民族性及中国文化

第五十五卷：文化与教育

第五十六卷：历史与文化论丛

第五十七卷：世界局势与中国文化

第五十八卷：中国文化丛谈

第五十九卷：中国文学论丛

第六十卷：理学六家诗钞

第六十一卷：灵魂与心

第六十二卷：双溪独语

第六十三、六十四卷：晚学盲言(上、下)

第六十五卷：新亚遗铎

第六十六卷：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合刊

第六十七、六十八卷：讲堂遗录

第六十九卷：素书楼余沈

第七十卷：总目



阎崇年：读书四忌

书“四忌”是：一忌不选择，二忌不定时，三忌不消化，四忌不践行。

一忌不选择

据统计,中国图书品种量居世界第一位,仅2013年就出版了四十万种图书。光图书目录每本按书名、作者或译者、出版社、出版年月、图书分类、提要等一百字计算,约四千万字,每本书若四十万字,需要一百本,我们光看目录也看不过来,怎能不选择呢!

怎样选择?

一个方法照“书目”读书。当年,陈垣先生向我们推荐清末洋务派首领、著名学者张之洞(1837~1909年)的《书目答问》,要我们根据其推荐的书目来选择书读。我到琉璃厂买了线装本《书目答问》,回家一看,所选的书目有二千四百九十三种。于是我发现张之洞其意虽好,却不切实际。所以,不仅对所读的书要选择,而且对推荐书的书也要选择。

再如,老大妈到菜市场买菜,买条黄瓜还选新鲜、直溜、粗细、长短,挑来挑去,何况读书呢;女士到鞋店买双皮鞋,也是挑品牌、式样、质料、花色、大小,以至于后跟的高矮,挑来挑去,更何况我们读书呢?

有人认为读书不必选择,开卷有益,碰到什么书,就读什么书。我的读书经验,以及很多人的读书经验,都是读书要选择。利用较少、宝贵的时间,获取更多、有益的知识,这就要选择图书来读。

怎样选择呢?

如经,先读“四书”和“十三经”中的《大学》。

为什么?读《大学》同读《十三经》比较来说,先读《大学》的好处是:

第一,字数最少。朱熹统计为一千七百五十一个字,我统计则为一千七百五十三个字。两者相差两个字,这里不必去讨论。如今大家都很忙,字数少,就容易卒读。

第二,文字通俗。《大学》在儒家经典中是最为通俗易懂的书。

第三,内容精粹。全书分作“三纲”即“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九个字;“八目”即“诚意、正心、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十六个字,总计才二十五个字,浓缩了儒家经典的精华。

如史,读“四名”即名人如司马迁、名著如《史记》、名篇如《太史公自序》、名句如“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如子,《老子》五千言。

如集,喜欢屈原读《离骚》,喜欢唐诗读李白,等等。

有人问我现代文学作品读什么,恕我孤陋寡闻,每年如果只读一本文学书的话,就读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品,2010年我读出生于哥伦比亚、后移居墨西哥的加西亚·马尔克斯著、范晔译的《百年孤独》,2012年读莫言的《蛙》,2013年读加拿大艾丽丝·门罗著、李文俊译的《逃

离》等。

二忌不定时

读书要定时间、定制度，才能持之以恒。我们一日三餐能够坚持，除肚子饿的因素外，六七点吃早餐，十一二点吃午餐，下午六七点吃晚餐，大体定时，家家如此，已成制度，才能坚持。读书也是一样。下面我举两个例子。

早上读书如康熙。康熙帝(1654~1722年)是个喜爱读书的皇帝，数十年如一日，手不释卷。他说：“朕自幼好看书，今虽年高，万几之暇，犹手不释卷。诚以天下事繁，日有万几，为君者一身处九重之内，所知岂能尽乎？时常看书知古人事，庶可以寡过。故朕理天下事五十余年无甚差忒者，亦看书益也。”(玄烨《庭训格言》)他在很长一段时间，早寅时(寅正四时)起，大约读一个时辰的书。卯时(卯正六时)，吃早餐，做上朝准备。辰时(辰正八时)上朝御门听政。这样，每天早上的读书基本定时，形成制度，这就有了时间上的保证。

晚间读书如赵普。赵普勤读书，善读书，定时间，有制度。宋制，宰相以未时(未正下午二时)下朝归第。赵普回家后主要是读书。《宋史·赵普传》记载：“普少习吏事，寡学术，及为相，太祖常劝以读书。晚年手不释卷，每归私第，阖户启篋取书，读之竟日。及次日临政，处

决如流。既薨，家人发篋视之，则《论语》二十篇也。”(《宋史·赵普传》)《宋史》本传评论道：“家人见其断国大议，闭门观书，取决方册，他日窃视，乃《鲁论》耳。昔傅说告商高宗曰：学于古训乃有获，事不师古，以克永世，匪说攸闻。”就是说，官员治国，重在读书，学习历史经验，借鉴历史教训，增加智慧，自身醇正，有益治国。

周末读书的人更多。许多人平时很忙，利用周末，或半天，或一天，集中读书。这也是一种好办法。

三忌不消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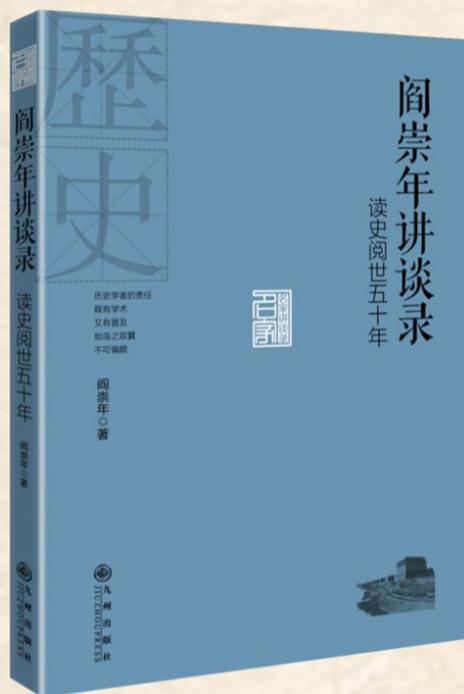
读书的一个大忌是食而不化。这如同吃饭，吃的虽然很多、很好，但吃了之后不消化，也不吸收，不是等于白吃了吗？如果在脑子里存储大量没有消化、没有吸收的知识，那还不如把知识储存在电脑的硬盘里，或者U盘里。一个移动硬盘，能存储一千G，可以原样保存，既不出差错，也不会丢失。

我们读书不是为了存储知识，而是一为知识，二为智慧，三为顿悟，四为圆通。因此，死读书，读死书，读书死，这种案例，史不绝书，应引为戒。

四忌不践行

读书要知行合一,学以致用。古人云:“一语不能践,万卷徒空虚。”(明·林鸿《饮酒》)

本文选自《阎崇年讲谈录:读史阅世五十年》



作者简介:



阎崇年,1934年生,北京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北京满学会会长、中国紫禁城学会副会长。著名历史学家,研究清史、满学,兼及北京史。出版《阎崇年集》(二十五卷),曾为央视“百家讲坛”主讲并出版《正说清朝十二帝》《明亡清兴六十年》《康熙大帝》和《大故宫》等,在国内外引发强烈社会反响,作品被翻译成英、德、法、韩等国文字。

主要论文集有《燕步集》《燕史集》《袁崇焕研究论集》《满学论集》《清史论集》等。

内容简介:

本书是著名清史学家阎崇年先生多场精华演讲、报告的讲稿合集。全书分为读书治学、地方人物、以史为鉴三大篇章,共十四篇。

本书中,作为史学家,阎先生将多年来致力清史研究的成果用通俗化的语言方式展现出来,让读者对清代有一个客观、完整的了解,拓宽了历史视野,另一方面作为一个事业有成的八十岁的老者,他将自己多年来的读书治学的心得,以及为人处世的经验精粹出来分享给大众,以期对普通读者的学习、工作和生活有所帮助和裨益。



冯友兰：两束雄文，一抹背影

民国时期的那批学人，有着与今天的学人迥然不同的风度、气质、胸襟、学识和情趣。他们的个性或迂或狷或痴或狂，但内在全不失风骨、风趣或风雅，底子上都有一个“士”字守着。



(冯友兰(1895-1990),字芝生,河南唐河人,哲学家,哲学史家。)

曾有那么一个年代,大学教授们矜持而有尊严。

1939年前后,陈立夫以国民政府教育部长身份三度训令西南联大必须遵守教育部新规定,包括教育部核定应设课程,统一全国院校教材,举行统一考试等。联大教务会议决定致函抗辩。此文的执笔者,“舍(文学院院长)冯友兰莫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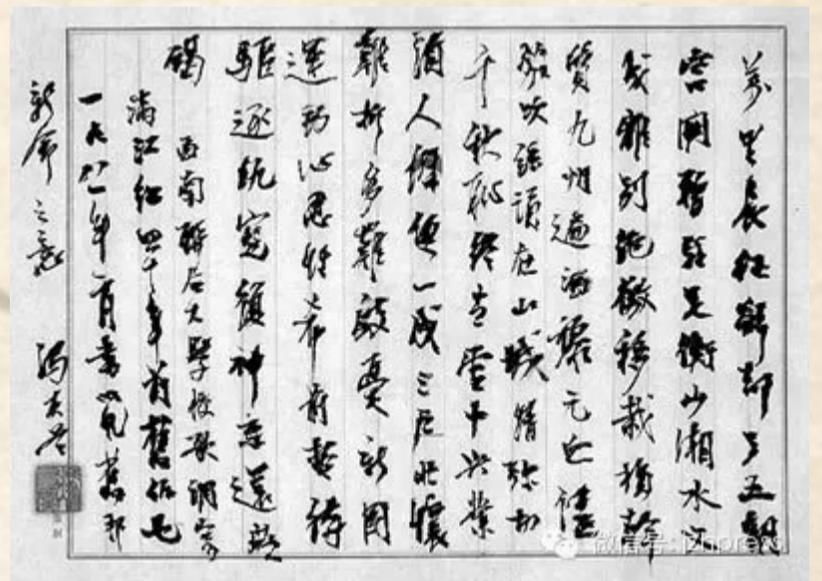
冯教授说得不卑不亢:“部中重视高等教育,故指示不厌其详,但准此以往则大学将直等于教育部高等教育司中一科,同人不敏,窃有未喻。”

“夫大学为最高学府,包罗万象,要当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岂可刻板文章,勒令从

同。惟其如是,所以能推陈出新,而学术乃可日臻进步也。今教部对于各大学束缚驰骤,有见于齐而无见于畸,此同人所未喻者一也。

“教部为最高教育行政机关,大学为最高教育学术机关,教部可视大学研究教学之成绩,以为赏罚。但如何研究教学,则宜予大学以回旋之自由。此同人所未喻者二也。

“教育部为政府机关,当局时有进退;大学百年树人,政策设施宜常不宜变。若大学内部甚至一课程之兴废亦须听命教部,则必将受部中当局进退之影响,朝令夕改,其何以策研究之进行,肃学生之视听,而坚其心志,此同人所未喻者三也。”



(冯友兰执笔的西南联合大学校歌)

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绝徼移栽桢干质,九州遍洒黎元血。尽笳吹弦诵在山城,情弥切。

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便“一城三户”,壮怀难折。多难殷忧新国运,动心忍性希前哲。待驱除仇寇复神京,还燕碣。

“今教授所授之课程,必经教部之指定,其课程之内容亦须经教部之核准,使教授在学生心目中为教育部一科员之不若。此同人所未喻者四也。

“……盖本校承北大、清华、南开三校之旧,一切设施均有成规,行之多年,纵不敢谓为极有成绩,亦可谓为当无流弊,似不必轻易更张。”

今人读之,拍案称绝,继而叹息良久。知识分子的尊严应该是这样的,政府、官员尽可以发号施令,但请注意,我们不敢苟同更拒绝执行——此之谓“同人不敏,窃有未喻”。知识分子的矜持也应该是这样,不滥说成绩,但内心怀有对学术的自信和对传承的期许——故“不必轻易更张”。

陈寅恪纪念王国维的雄文,为学者立出“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境界。冯友兰的雄文,则被后人赞为铭刻了一所大学“力争学术自

由,反抗思想统制”的光荣品质。

冯友兰早年撰文,气象阔大而意义深沉,每每众望所归被推执笔重要文字。1943年,他执笔起草致蒋介石的信函,要求政府为收拾人心而开放政权,实行立宪。据说,蒋当时看信后的反应竟是“为之动容,为之泪下”,即刻表示愿意实行立宪。

其另一雄文《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碑文》,被公认为最能表彰西南联大的精神及其特殊历史意义。与联大渊源颇深的史学大家何炳棣称此文为融古烁今的“至文”、“不朽文章”:



(西南联大纪念碑)

“中华民国三十四年九月九日,我国家受日本之降于南京……河山既复,日月重光,联合大学之使命既成。

“我国家以世界之古国,居东亚之天府,本应绍汉唐之遗烈,作并世之先进,将来建国完成,必于世界历史居独特之地位,盖并世列强虽新而不古,希腊罗马有古而无今,惟我国家亘古亘今,亦新亦旧,斯所谓‘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者也。旷代之伟业,八年之抗战,已开其规模,立其基础,今日之胜利,于我国家有旋转乾坤之功,而联合大学之使命,与抗战相终始,此可纪念者一也。

“文人相轻,自古而然。三校有不同之历史,各异之学风,八年之久,合作无间,同无妨异,异不害同,五色交辉,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终和且平,此其可纪念者二也。

“联合大学以其兼容并包之精神,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获民主堡垒之称号,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此其可纪念者三也。

“……联合大学之终始,岂非一代之盛事,旷百世而难遇者哉!”

然而何炳棣在对碑文大加推崇后,随即颓

然抱憾:此碑永存,而它所代表的学术自由精神未数载即开始消逝了。

事过30年,冯友兰作《联大纪念碑碑文自识》,评价道:“文为余三十年前旧作。以今观之,此文有见识,有感情,有气势,有词藻,有音节,寓六朝之俚句于唐宋之古文。余中年为古典文,以此自期,此则其选也。承百代之流,而会乎当今之变,有蕴于中,故情文相生,不能自己。今日重读,感慨系之矣。敝帚自珍,犹过于当日操笔时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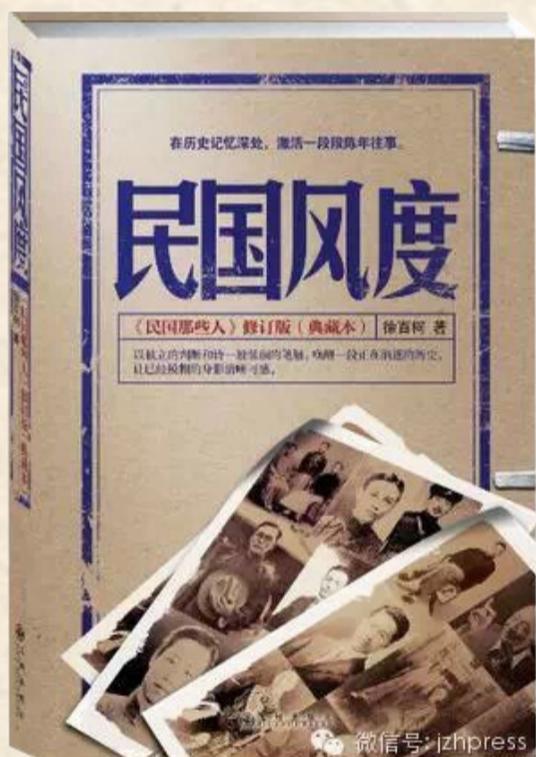
(冯友兰)

研究者称,其实冯氏的感慨,岂止是“敝帚自珍”,分明是沉重的历史慨叹。在他所忆那个逝去的年代里,教授们的见识和感情,少有羁绊,发诸笔端,于是成就了一篇篇雄文。

当见识和感情受到羁绊，难以发为雄文，于是便只留下一抹颓唐的背影。及至中年以后，历经数次运动，冯友兰曾就个人历史多次写过检讨交代，甚至不惜上纲上线，却都难以过关。

一天，逻辑学家金岳霖来看望他时，两位大教授竟为检讨的事抱头痛哭。

本章内容选自《民国风度》



内容简介：

本书为《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最佳专栏——“钩沉”结集，其专栏主笔徐百柯从故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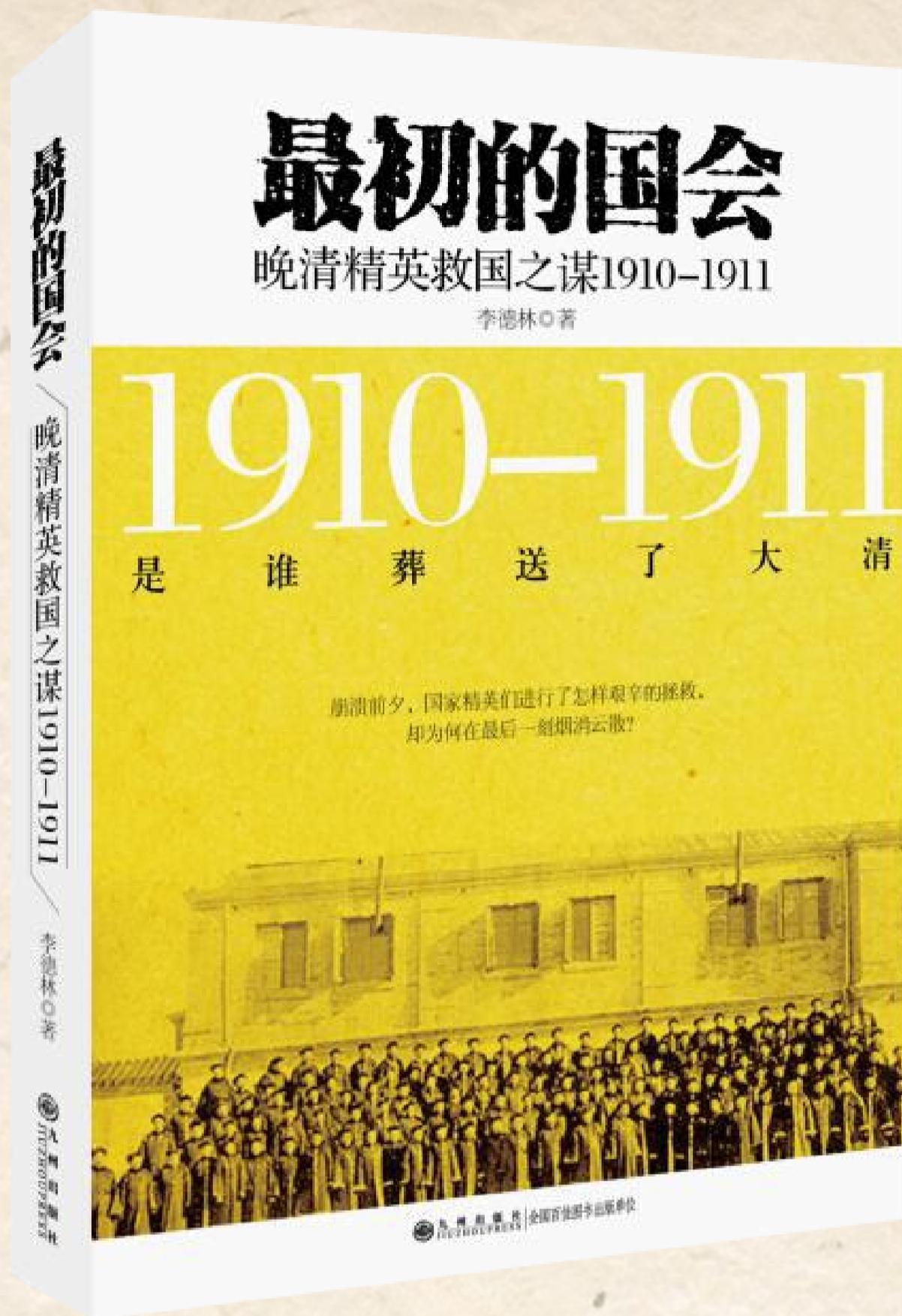
堆里或人们的记忆中，钩起79个人物。这些人有些是我们些许熟识的，还有一些人物，徐百柯如果不写，恐怕将会被时间或时代彻底湮没与忘记。

他们是故去的名校校长，文章报国的报人，埋头学问、以学术报国为天职的知识分子，以及在世界面前代表中国的外交家、金融界的精英、马上赋诗的将军……他们是梅贻琦、蒋南翔、张季鸾、胡政之、刘文典、杨荫榆、陈西滢、梅汝璈、顾维钧、卢作孚、陈望道、蒋百里……

围绕着他们的一幕幕鲜为人知的传奇秩事，通过本书在历史零散与完整的记忆中生动再现。他们曾经的理想，他们的面容和言行，他们的风度、气质、胸襟、学识和情趣，在徐百柯的文字中一一复活。

作者简介：

徐百柯，四川成都人。毕业于北京大学，获比较文学硕士学位。目前任《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主编。2004年6月《冰点周刊》创刊，人物版设“钩沉”专栏。徐百柯主笔两载，“钩沉”被评为《冰点周刊》最佳专栏。期间文字在此集结成书。



最初的国会，晚清崩溃的丧钟

◎ 一木

1910-1911年，注定将成为中国历史的一个节点，大清王朝摇摇欲坠，立宪派、改革派、革命派纷纷登场，

1910-1911年,注定将成为中国历史的一个节点,大清王朝摇摇欲坠,立宪派、改革派、革命派纷纷登场,慈禧太后最终把预备立宪当作挽救大清倾覆的最后一根稻草,然而,大势所趋不可逆转,让他们始料未及的是,最初的国会竟然成为晚清覆亡的引火索。《最初的国会:晚清精英救国之谋 1910-1911》,将目光聚焦到晚清覆亡前夕的1910-1911,试图从细节揭示大清崩溃的原委。

自从签订《辛丑条约》,慈禧太后决定发奋图强,开展全方位的改革开放,制定了颇为详尽的改革方案和时间表,这其中就包括立宪运动。而慈禧太后去世之后,清朝的权杖交到了25岁的摄政王载沣手上,权力的交接,并不意味着领导主导权的顺移,他并无慈禧太后那般的操控力和主导力,致使清朝的改革开放和立宪运动都失去了强有力的主导者。随着时间的推移,由皇族成员为主组成的内阁与地方士绅势力的冲突加剧,原本对载沣充满期待的各方势力纷纷由期望转至失望。

与此同时,中央集权加剧了地方对满族“宗社党”的猜忌之心,最终促使激进的立宪运动在1910-1911这两年的时间达到了高潮,并以辛亥革命的爆发宣告了失败,中间经历了各省咨议局议员请开国会、山东莱阳大饥荒、为戊戌六君子平反、上海股灾、大参案种种大事件,大清国终于宣告寿终正寝。

《最初的国会:晚清精英救国之谋 1910-1911》全书,一直有一条主线,作者要回答一个问题,为何当改革在清朝最后的五十年中已经成了主旋律之时,立宪及宪政遗产不仅没能消弭多股政治势力的分歧,相反成了分化摄政王执政集团的催化剂,直接导致了大清的覆灭?

摄政王柄国之初,传统的士大夫已经成功地向现代精英转变,以梁启超为首的改革派在立宪的旗帜下如火如荼地进行改革的顶层设计,北京城的亲贵们奔走于改革派之门。改革的精英们不断地触碰帝国的政治红线,试图通过渗透意识形态进行柔性的政治体制改革。改革犹如一锅煮沸的水,无论是朝堂枢臣,还是贩夫走卒,对摄政王的执政集团充满信心。一度对革命信心满满的孙中山,在一次次城市暴动失败后,面对摄政王执政集团的改革新气象,都只能默默地在美国人的餐厅端盘子。

但是,武昌城的一声枪响,世界变了,这声枪声成了推倒清政权的多米诺骨牌,各路流亡海外的革命党星夜兼程回国。而当武昌城的硝烟正浓之时,北京城的资政院精英们纷纷登台,谴责铁路国有的罪魁祸首——邮传部大臣盛宣怀。一份开放党禁、赦免政治犯的文件送到了摄政王的手上。可一切都晚了。大思想家严复议员的大清国歌还没有来得及奏响,大清王朝崩溃了。

一个时代的终结有千万个理由,但作者通

过晚清改革精英们的系列救国韬略入手,来探寻清王朝崩溃的根源所在,而其时的资政院无疑成了他最佳的视觉切入口。在武昌城枪响的一年之前,来自全国各地的政治精英们在北京资政院济济一堂,他们在北京的预备国会现场紧张地审查政治、军事、财政、意识形态等事关改革顶层设计的方案,在争吵中达成了共识,最终都送到了摄政王的案头,他们希望将慈禧太后的宪政遗产变成现实,让宪政之花在封建的土壤上盛开。

其时,年轻的摄政王根本无力调和各大政治势力的分歧,无论是纷争不断的资政院,还是明争暗斗的紫禁城,摄政王犹如一具木偶,只是在枢廷之上陪着他的小儿子看令他厌倦的宫廷闹剧。对于病入膏肓的大清王朝而言,他们需要的是一剂强心针,更希望有可以包治百病、起死回生的良药。他们总错误的认为立宪就是他们要找的灵丹妙药。这就注定了此次立宪运动的走向和结局。

改革本身就是一场利益的重组,尽管改革精英们的顶层设计犹如一把把钢刀,但既得利益集团们却在用手中的权力捍卫着他们的利益。面对如此形势,年轻的摄政王无力回天。当既得利益集团拒绝在最后一刻向宪政改革让步之时,曾经试图通过自上而下进行宪政改革的精英们,最后只能擦干脸上的泪水,投向共和的怀抱。



我更爱你备受摧残的容颜

很多人认识杜拉斯都是因为《情人》中的那句：
“我认识你，永远记得你。”



(杜拉斯图片来源：网易女人)

很多人认识杜拉斯都是因为《情人》中的那句：“我认识你，永远记得你。那时候，你还很年轻，人人都说你美。现在，我是特地来告诉你，对我来说，我觉得现在的你，比年轻时候的你更美。与你那时的面容相比，我更爱你现在备受摧残的容颜。”

很多人并不知道，我更爱你备受摧残的容颜，原话就是出自扬，他用世间最温情的言语告诉众人，他爱她，不是因为她美，而是饱经沧桑的容颜下愈加真实的内在。他从未想过离开玛格丽特。就像玛格丽特希望出走的扬会像当初一样突然地闯入，敲开她的门扉，告诉自己，我是扬，我是你的扬。

1980年的夏天。那个二十七岁的男孩款

款地向她走来，他叫扬·勒梅，是在康城读书的一名哲学系学生。他是玛格丽特的忠实读者，虽然他们相识于1980年，但他很早就拜读过玛格丽特出版的所有作品，只是无缘见面。扬说他第一次读玛格丽特作品《塔吉尼亚的小马》时就对她一见钟情。

玛格丽特更换了扬·勒梅这个名字，给他取了一个全新的名字叫扬·安德烈亚·斯泰奈。没有欢喜亦没有伤感，他用重塑的自己、全新的名字去融入她，接触她，认识她。她的暴怒、谩骂、呵斥、殴打……都是他以后要面对的。他默默地为玛格丽特充当了多重角色。

六十六岁的玛格丽特和年仅二十七岁的扬正式开始了一场轰动的黄昏恋。



(杜拉斯和她的情人扬·安德列亚，扬已于2

014年7月逝世图片来源：网易新闻)

相处的时间里,他们有痛苦,有欢愉,有欲望,有嫉妒,甚至更多。她给扬写信:“我要你写你不爱我了,在信尾署上你的名字,这是笔录。您写上:我不爱您。您写上日期,然后签上名。在信尾,您补充一句:我不能爱一个女人。”扬没有写上名字。草草几笔,虽然很容易写下,但在心里,就像利器,疼痛穿肉而过。

玛格丽特去世前,扬对她的朋友说:“年龄的差异之所以使我为难,只因她将比我先死。我无法想象她会死,我仿佛觉得已跟她生活了好几个世纪,我无法想象末日。我和她一起,以永恒的方式生活。我喜欢想她。她太可爱了,我会产生拥抱她的念头。她呼唤暴力,逼我发火。他甚至想到玛格丽特笑着对他说:‘是的,我是恶魔。’”

经过时间的磨合,他们渐渐适应了对方,彼此都习以为常。虽然酒精会催促她的死亡,但扬觉得酒精也是可爱的,它能让他们不会在乎爱的远近,他们彼此相惜。



(1985年,杜拉斯与扬·安德烈亚在诺弗

勒堡图片来源:新浪读书)

《蓝眼睛黑头发》里写满了许多爱而不能的片段,不知道是什么刺激了他,那阵子疯狂叫嚣的不是玛格丽特,而是扬。他帮玛格丽特打字的时候不叫,一旦休息下来,他抓狂地叫着,他叫玛格丽特不要写,玛格丽特也怕刺激到扬,但扬最后还是会默默地把杂乱无章的断句拼接而成,直至出书。

玛格丽特是个很率性的人,她很坦荡,会直白地告诉别人,我就是很难相处,连自己的儿子都说我恶毒,那又怎么样。她觉得世间的男人都会喜欢她,因为她是个出名的作家。她曾经扬言说,如果我不是一个作家,会是个妓女。这种大胆不加掩饰的话,不是一般女子说得出来的。也正因为她的与众不同、果敢热辣,才会让人一见倾心。

扬是浪漫的,同样也是悲剧的。他经历着“君生我未生,我生君已老”的过程,人生最难过的不是遇不到爱的人,而是遇到了,她却两鬓斑白,不久于人世。她也知道自己气数已尽,肺气肿的病症愈加严重,呼吸急促和缺氧的现象频频发生。她想活着,拼命地与死神抗争。她决计,不到死的那一天,绝不停下她的笔。

她在一个本子上写道：

未来

男人，知识分子，生活的贫瘠

只有速冻食品

不再有房子

不再有咖啡

不再有管家，空间

女人男人的未来

即便死亡临近，她的联想力依然没有枯竭。男人是她一生的源泉，她无法生存于没有男人的世界。



(杜拉斯图片来源：凤凰读书)

玛格丽特殁了的那天，扬特地请了迪奥尼斯来给她合眼，她终于合上了她的人生剧本，终

于能如愿地死在爱人们的身边，不留遗憾。扬是幸福的，因为在死前，玛格丽特还记挂着他，他是她人生尽头里最无法割舍的爱情。

她说：“扬，我还在。我得走了。我不知道把自己放在哪里。”

玛格丽特留给扬的最后一句话是：“我爱您。再见。”

“我站在您面前，等待着。您再也不说话了，眼睛不再看东西。我看着您的脸，不敢碰它。我不想碰到您冰冷的皮肤，我不能够。这是唯一的一次。我不能碰您……我看着您。我看着面前这张闭着眼睛的脸。她没有睡，然而，她死了，的确死了……”

再也不见了，她紧闭着嘴唇，合上了灵动的双眸，脸上妆容浅淡，像是安稳地睡着了，她不再发声。她穿着扬带来的墨绿色大衣，扬静静地望着她，看似很近很近的距离，却到了很远很远的世界。若人世间还能轮回一圈，那该多好。他愿是她笔下的杜撰，只愿存在她的字里行间，把一切荣辱和过往云烟都渐渐隐去。他不愿说再见。

因为他爱她，胜过爱世上的任何人。

1996年3月3日，那个笔名以杜拉斯扬名的玛格丽特·多纳迪厄在圣伯努瓦街去世，享年八十二岁。

3月7日，她的哀悼仪式在圣日耳曼教堂举行。她的书迷，她爱的人，都纷纷赶来送她一

程。葬礼的司仪对扬说：“先生，您可以在棺材里面放一件东西。这是习俗。您可以在他们完全把盖子封死之前放进去。”扬原想把《情人》这本书放进去与她同眠，但他什么也没做，那本小书放在大衣的口袋里，像她的叮咛，她的存在，陪伴着没有她的岁月。

她埋葬在蒙帕纳斯公墓中，她的墓前刻着“M·D 玛格丽特·杜拉斯 1914—1996”。

(杜拉斯和扬图片来源：M y 1 9 3 0)



“1998年11月16日，我回到了蒙帕纳斯公墓。我可以重新去那儿，看那块白色的墓石了。我可以重新读那个名、那个姓和那个日期了。我发觉那块白色的墓石旧了，颜色脏了，经历了不少风吹雨淋日晒。有人来献过花，都烂在那里了。墓石已经变旧，您在这儿，被封在那儿已经很久很久了。人们只能看见您的名字，您的身体正在消失，完全腐烂了。没有任何东西可看了。只有名字，其他什么都没

有。”

没有玛格丽特的日子，扬成了行尸走肉，他拒绝见任何人，只愿躲在那幢空荡的住宅里，置身满是回忆的空茫中，错愕于虚幻的影子。一回首，惊觉枉然，只叹是天涯相思。他酗酒、啼哭、哀嚎、自杀……甚至浪迹。醉醒多少回，才能拒绝这无情的日月交叠。回眸了五百年的缘分，却在这残余的时光里耗尽着岁月的灯火。

三年后，他写了一本《情人杜拉斯》，纪念他们的感情。这个男人用深情的眉笔给她上妆，用思念的脂粉给她润色，他担忧她一个人在那里太孤单了，怕她就这么默默灰烬。她在那座小小的坟茔里，与风雨为伴，与燕儿呢喃。那里不用面对世事的纷扰，寂静地能听见笔墨的流淌。他带着她的影子漫步于人世间，年年依旧。那些无法奔逃的思念，细密地跳跃到字里行间，那些被借走的灵魂，如同锐利的刀刃，切割着丰沛的情怀，瘦骨嶙峋的皮肉都记挂着那份难舍的酸楚。

你说过：“就是死了，我也还能写作。”所以，你活着，你活在千千万万的人的心里吧。你走得很安详，你用亡魂雕琢着那些还未来得及描摹的爱情。你的一句告别，让我多想成为你书页里的那片红枫，被你放置在案头也好，夹杂在你的故事里也好……

可惜，你不会有那抹心思。

你只会说,说爱我吧。你爱我吗?

请你原谅我,我爱你至死不渝

JZHPRESS,悦读九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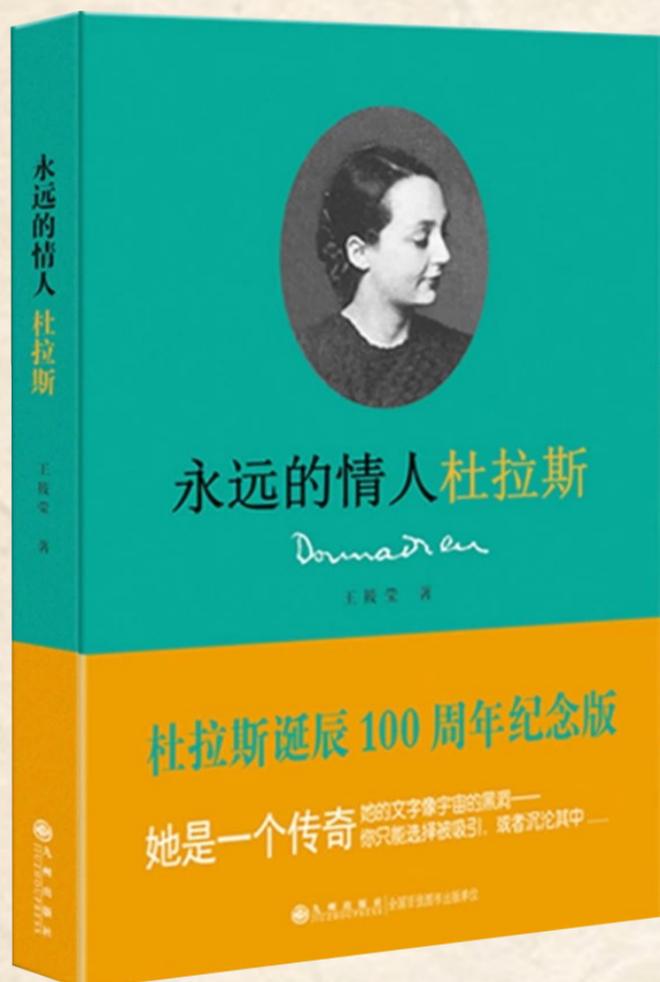
本文选摘自《永远的情人杜拉斯》王筱莹著,

九州出版社出版

著名的小说《情人》,该作品于1986年获海明威奖,是“当年用英语发表的最佳小说”。

杜拉斯的一生就像一部小说,她为艺术生活,为爱情疯狂。身为作家,她享誉世界,却也难排孤独,在酗酒中老去。本书是用传神的笔调,再现了杜拉斯传奇的一生,让读者再次贴近她的点滴记忆,再次感受杜拉斯的特异魅力。

内容简介:



玛格丽特·杜拉斯(Marguerite Duras)是二十世纪最有影响、最具个性、最富魅力的一位女作家。1984年,杜拉斯在七十岁时发表了她最



十位名人的人生和卦象

◎余世存

卦象与人生,让我们带你揭秘十位名人的人生
走向

1 . 随卦 邓丽君



随卦是少有的元亨利贞之卦，有追随、相随之象，有流行、喜悦之象。邓丽君的人生跟随卦偏好相关。台湾当局给她的褒扬令很是八股：“砥砺奋发，育成大家范型，柔美婉约，深得风人意旨。”“乃复义不帝秦，行止弗入中土，……大节凛然，辉耀千古，先圣有言，志道、据德、依仁、游艺，斯人有之。叹以英年遽逝，悼惜良深，应予明令褒扬，以资矜式。”

2 . 屯卦 张瑞敏



屯卦跟积累、创造相关，有危机感。张瑞敏先生的人生正是屯卦偏好，他的海尔是当代的常青树，他是少有的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人，他的危机感众所周知。“勿用有攸往”、“利建侯”。他不出山东青岛一隅，以企业家身份名贵海内外，自十四大始即是代表，且是十七、十八大的候补。人生可谓利而“建侯”。

3 . 噬嗑卦 吴敬琏



吴敬琏先生的人生与噬嗑卦的偏好相关。噬嗑卦有吃喝、交易、市场之象，“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盖取诸噬嗑。”吴先生得“吴市场”之誉，既是命中之事，也是他个人的努力。当然，噬嗑卦人“利用狱”，有纠纷之象，一叹。

4 . 艮卦和谦卦 蒋介石



蒋的人生跟艮卦和谦卦的时空偏好相关。艮卦意志坚定，蒋作为二战反法西斯的东方大国领袖当之无愧；艮卦善反省，可解释他几十年如一日地记日记、反省自我。艮卦人中“君子思不出其位”，可解释他作为一个有人格期许的君子，不会做出格之事。批评者讽刺他“民主无量、独裁无胆”，似不知知人论世。

谦卦时空的偏好有“谦卑”、“利涉大川”，蒋一生东求西寻，或学或盟，卑以自牧，而自性不失。谦卦“勤俭”，蒋勤于事业，生活简单，不抽烟，不喝酒，不饮茶，只喝白开水。谦卦偏好还有“韬晦”，蒋多次主动下野，而能担一时一国之重。谦卦有成圣成大贤之象，“君子有终”，蒋的晚年可谓善终。

5 . 萃卦和归妹卦 孙中山



孙的人生跟萃卦和归妹卦有关。在清末浑浑噩噩的氛围里,在先进的先觉的革命党立宪党人中,孙都堪称出类拔萃,是以武昌首义跟他无关,大家仍请出前不久在餐馆洗盘子的他就任大总统。萃卦有“聚众”之象,孙的人格魅力使大家听着听着“就跟着他走了”。当然,孙也萃取,他曾说:“我亦读书破万卷也。”

归妹卦偏好峻急。严复劝孙,“为今之计,惟急从教育着手,庶几逐渐更新也。”孙文回答说,“俟河之清,人寿几何?君为思想家,鄙人乃执行家也。”孙文为论者诟病的一些言行如急于发动二次革命、“毕其功于一役”等等,既是认识问题,也是性格问题。归妹卦人可娶名花,孙文一生英雄美人,也算佳话。

6 . 遁卦 鲁迅



鲁迅是遁卦。他一生都在弃绝,“有所不乐意的在天堂里,我不愿意去。有所不乐意的在地狱里,我不愿意去。有所不乐意的在你们将来的黄金世界里,我不愿意去。”他一生都在逃遁,“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暗故园。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

7 . 坤卦 胡适



胡适的人生成就跟坤卦偏好相关。在鲁迅以为悲凉或风刀霜剑的时代,胡适却活得平实,甚至有滋有味。“直方大,不习无不利。”坤卦有文明文化之象,胡适一生即示范了文明。“龙战于野,其血玄黄。”胡适一生面对并参与了科学与玄学、东方西方的交锋对话。当然,胡适更说出了“厚德载物”般的名言:“容忍比自由更重要。”

8 . 蹇卦 陈嘉庚



陈嘉庚先生是蹇卦人,蹇卦人的人生在路上,坎坷、艰难,然而“往蹇来誉”、“大蹇朋来”,蹇卦君子能够“反身修德”。陈先生自承:“鄙人所以奔走海外,茹苦含辛数十年,身家性命之利害得失,举不足撓吾念,独于兴学一事,不惜牺牲金钱,竭殫心力而为之,终日孜孜无敢逸豫者,正为此耳。”

9 . 离卦 本 . 拉登



离卦有精神之象,有重明之象。代表某种精神的本.拉登也曾有重明。“9.11”的明火执仗可算一次,他死时的战火可算一次。离卦有贞定之义,拉登的折腾可谓大凶。有意思的是,美国人突如其来地攻击,拉登住处燃起战火,他被打死,随后被扔葬于大海,正应了离卦第四爻:“突如其来如,焚如,死如,弃如。”

10 . 屯卦 霍金



令人惊异的是霍金,他的人身存在方式即是“屯”字,他的人生偏好示现的是屯卦的偏好。“乘马班如,泣血涟如”,当他从楼梯上摔下来后,居然在轮椅上困顿了四十多年。屯者,难也。但屯也是元亨利贞的,他“勿用有攸往”,却能“利建侯”,成为继爱因斯坦之后著名的科学思想家和杰出的理论物理学家。

谷雨

